



政治節操問題

洪鼎鐘著

中國社會服務社廣西分社出版

政治節操問題

序

記得和賈理鳴先生第一次在故都見面的時候，就論到黨的問題，我認爲社會風氣的敗壞：「一般不願信義，詐僞相尙，此種惡風氣感染至於本黨，便形成黨員的精神渙散，黨德墮落，這必須要從每一個黨員的志行上，能卓然特立，樹立楷模，形成鼓舞社會轉移風氣的堅強力量，三民主義纔能真正實現，中國才能得救。否則，我中華民族將永遠沉淪於深淵。」在當時賈先生是許爲知言，這是十年以前的往事了。我回想這十餘年來事業上是一無成就，不過我敢自信，尙能本着做人的一貫志趣，落得一身清白，正如朱夫子說：「晚年磨來磨去，難得這般有脚跟底人」，因此我更需要時刻督責自己，鞭策自己，不使我這一點認真做人的志氣銷沉下去。

我們古先聖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貫大道，是由內發揚到外的。不能修己，焉能治人，祇要把許多現實問題合攏來看一看，實行新縣制啦，講統制經濟啦，——雖然這一切均有精詳的規劃，講嚴的法令，但由已往施政的情形來估量今後新政的成果，實在是令人有幾分疑慮。倘若人人內心上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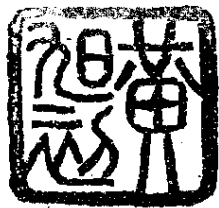
缺乏一種自爲控制的力量，難保沒有人來濫用權力假公濟私？又從朝野的關係來看，要以誠相見，才能掃除一切隔膜，才能消滅一切對立與磨擦。大凡一個國家不能獲得精誠團結之故，惟在各方面都在作「損人利己」的打算，不能自爲克治其私慾。所以無論在朝在野，都需要洗心革面來澈頭澈尾作一番自省的功夫，這便是我所要討論的「政治節操問題」。

我寫下這本小冊子的意思：一則是要有條理的尋出做人做事的根本法則來。二則藉以發抒我十餘年來心中的蘊藏；更拿來作爲我做人的事的一種信誓——像周佛海一類評定歷史功罪的人，他竟然充當第一流漢奸了。更有人自己沒有上台罵人家貪污，但一朝得志，甚至貪污的本領，還要高人一籌！我如此立志，不去作一個前後功罪相反的人；如果大家都能自相期許，不當漢奸，不貪污，負責任，守紀律，不存苟且的心理，造成社會上一種自己督責自己，控制自己的風氣，這樣於世道人心，就不無補益了。

這裏我深刻地感激 黃主席、盧專員、倪教育長的鼓勵和幫助，我想他們都是勉人爲善的意思，更可以說是爲了樹立優良作風，期能收到一點披沙揀金的效果。同時我更深深地感激李一真教授指出我文詞上的瑕疵，給予我一個修正的機會。總之，我因此深蒙師長的訓教和嘉勉，將使我今後做人做事得到更深一層的認識，更賦予我以新的保證，也就是我重新做人做事的起點啊！

從政須知

黃旭初題



己立立立

盧象崇



372.42
342



5538

目次

一	政治節操的重要性.....	一
二	政治節操與民族道德.....	一四
三	歷史的回顧.....	三三
四	當前的問題.....	五六
五	執政時代應有的警惕.....	七九
六	在野時代應守的信約.....	九七
七	餘論.....	一一六

政治節操問題

一 政治節操的重要性

我中華民族果真從此一蹶不振，而陷於最柔靡最墮落的牛馬奴隸的地位嗎？果真從我們這一輩子食鄰自私——無氣節、無是非，奄奄無生氣，以斬絕我子孫後代繁榮滋長的命脈嗎？我們要怎樣去挽回國家的機運呢？許多對我國歷史文化心存蔑棄的人，以為中國是一個傳統的柔靡不振的民族，竟不知晉僑尊王攘夷知行合一之學說，移植於東鄰，乃形成所謂武士道，而我出產地之中國則無役不失敗，反受其侵侮毒害，我先民之優異的民族精神，反漸濯滅無聞，而造成今日如斯創鉅痛深之慘局。更論到抗戰，識者以為中國問題，乃世界問題之一環，要爭取抗戰的勝利，就有待於國際有利局勢的發展。現在太平



(寧)

洋的烽火連天了，實已臨到千載一時的良機。如何去把握這千載一時的良機呢？時至今日，不能再因循，不能再苟且，惟一的在充實內心的準備，質言之，就要「重鑄寶魂」！不然將何以洗刷我祖宗千百年來之奇恥大辱？

中國積弱不振的原因。 中華民族何以積弱至此？當着嚴重敵國外患、創鉅痛深的今天，還不能令我們痛自砥礪以奮發鼓舞嗎？如果我們不能把握這千載一時的良機，我民族國家奄奄一息的生命，將要被斬絕了。我們在今天應該大聲疾呼、去喚醒一般醉生夢死與自私自利的人們，因為從國際局勢看到國內的景象，足以妨礙我們國家民族生存和發展的主要因素，就是一般人不講氣節，不知廉恥，沒有養成崇高的政治節操。一言以蔽之，便是「士風萎靡，民氣頹喪。」正如管子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現在我們睜眼看一看，還不是由於紀綱不振人心無從振奮嗎？

雖然在今日「士風萎靡民氣頹喪」，但我們的民族性，確有其優異的地方，這充分表現在民族抗戰五年以來血肉迸裂堅苦奮鬥的過程中。曾記得在抗戰的初期，國外人士對我有過這樣的批評：「中國無論在物質上或精神上，都不够抵禦外力。」現在從抗戰的血泊的教訓裏，又從國際局勢急轉直下的演變中，應該給予我們不少的鼓勵和興奮，這因為已充分顯示出民族性的優劣，是國家存亡的關鍵！但是要使民族性的優點維持永久於不敝，就要全國朝野上下能顯示出崇高的「政治節操」。現在敵寇心目中，

不是時刻在進行「打擊我們的精神以收攬人心」的狂妄企圖嗎？

固然，一個民族的成長，是受着地理環境和自然條件的支配，同時要倚賴着優美的歷史文化而孕育鑄造出崇高的民族精神，才能鞏固一個民族的團結，而奠定其強固的立國基礎，所以一個國家民族的存亡絕續、治亂興衰，完全表現在「民氣」上。這裏所謂民氣，不是一時性的狂燥和衝動，乃是一般要具有高尚的意志，偉大的抱負，更需要具有沉毅勇邁的精神。譬如說：「是非混淆，正義磨滅」，當然是「一個國家敗亡的徵兆，然則要怎樣去圖補救？怎樣才不會使「是非混淆，正義磨滅」呢？

一個國家沒有旺盛的「民氣」，尤其當着有敵國外患的時候，還存在一種醉生夢死麻木不仁的頹頹狀態，是不够抵禦外侮的。反觀我國抗戰以來的國內局勢，是否鑒於國家民族之危殆，在刻刻振厲而痛自悔悟呢？是否我們在精神上或物質上足以抵禦外力？是否社會上還存在若干敗殘的風氣？雖然在抗戰過程中，曾表現不少英勇奮鬥的偉烈奇蹟，造成許多可歌可泣的記載，然而貪污漢奸之不斷生長——無法稍戢其貪殘的野心，實沾污了我民族抗戰的光榮史實。因此也便引起了人們對抗戰認識的模糊，而缺乏其對「抗戰建國」必勝必成的信念了。我們要怎樣來挽回國家的機運呢？就要全視人心振靡、政治節操的弛張以爲斷啦。

當前應具有的警覺。我們正處在這一「抗戰建國」的艱鉅時代，要竭盡堅貞刻苦的努力，忍受一切苦

痛，摒除一切私利，去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苟一旦漫不加察，一切的措施，不能適應抗戰的要求，不能關注於民生福利，遂使敵寇從容施展其懷柔政策——以收攬人心，打擊我們的精神，則吾民對抗戰的情緒日漸低落，將士的鬥志日見鬆懈，我們將憑什麼來支持長期抗戰去爭取最後的勝利呢？同時我們一向力竭聲嘶所狂呼的精誠團結，在今日還是各存猜忌，互相牽制，還是爲着自己黨派作私利的打算，估計的錯誤，遂無形墮入敵寇以華制華的術中，而造成「親者所痛仇者所快」的現象。這樣由於內在的矛盾和不安，便無形削弱抗戰的力量，更能阻抑於艱鉅建國工作的完成，這還值得我們猛省惕勵嗎？

在抗戰的過程中，不斷把民族性的優點與弱點充分暴露出來，如何發揚其優點，如何糾正其弱點，雖有賴於各方面不斷的努力，然而最根本不過的問題，便是「精神的改造」；因此全國三年來一致集中在「精神總動員」的目標之下努力，當然我們爲了要能「愈戰愈強」，而促成敵寇的「愈戰愈弱」；但是我們要怎樣使「精神總動員」的運動獲得普遍的發展呢？怎樣能因這一運動的開展而收到更偉大更實際的效果呢？簡明的答案，就是要求社會上各部門的領導人士能洗心革面做出好的榜樣出來，才能端正社會的趨向，改正一般人的錯誤觀念。

總裁對此會有過這樣的暗示：

「我們要坦白切實的自己來檢討一下：我們國民精神，跟着戰爭的進行，果真有確切的進步了嗎？我們過去的缺點，已經在抗戰中間洗滌淨盡了嗎？我們有職責的人，已經盡了責任嗎？有能力的人已經盡了能力嗎？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已經一致地嚴肅緊張了嗎？我們前方後方已經確實做到呼應一體休戚共同了嗎？我們的思想言論行動，已經完全集結到「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的目標之下嗎？我們每一個人的所言所行，已經做到表裏一致了嗎？我們慷慨熱烈的抗戰氣概，個個人都能始終如一夷險一致地貫徹到底了嗎？我們能絕對的不搖不奪不欺不偽嗎？再則，我們對「抗戰建國」的信心，能够使每個國民都接受都領悟了嗎？我們能使敵人和一般傀儡漢奸認識我們的民族精神為不可侮的力量了嗎？我們一般社會生活形態，是已經切實做到戰時生活的條件了嗎？我們知道有良心的同胞想一想自身，再看一看自身週圍的社會，必然覺得我們有格外警惕、格外振作、格外互相勉勵督責的必要了。」（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一日重慶市國民月會廣播講詞）

直到於今，我們認為這種血忱的昭示，還不足以刺激當時的人心。誠然在當前一致集中努力於國民精神根本的改造：新生活運動的推行，精神動員的實施，但不曾使一般人在精神上行動上有着顯著的進步。這是一個什麼原因呢？是教育上的缺欠嗎？我們以視斐希特鼓舞德意志民族的成功，因為他提出了「族國主義」及徹底改革教育制度的主張，所以後來普法戰爭時德意志的戰勝法國，很多人歸功於斐希

特。我們今日的處境，也很像當年的德意志。當然要培養現代的民族意識，以及發揚民族的德性，教育是具有決定作用的，因此要針對當前的需要，來決定我們的教育方針。不過我們為補救目前計，不能單靠教育的力量來變易風氣，必須要採用最有效的方策，來嚴厲裁制這一切貪殘腐惡的行爲；也就是說：我們要以大刀闊斧的手段，從施政的政績上，輿論的指導上，一切的褒揚與懲罰，使人們能辨別出正義與是非來。現在我們國家的生死存亡，已間不容髮，還容我們偷生養息瞻顧徘徊？那麼不旋踵國亡種滅隨之啊。

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我們認爲一般國民身心不健全的狀態以及表現在政治上貪殘腐惡的行爲，完全要歸罪於教育本身的缺欠嗎？當然也是其中原因之一，不過還有一個最根本的問題。這裏可以從兩方面去看：

從一方面說：一個國家有了優異的民族精神，尤其一旦遭遇外患的時候，能顯示出反抗異族的熱烈情緒和英勇抗戰的精神出來，更需要守正不阿的人來執行國策，才能使這種優異的民族精神，繼續發揚而光大；否則，便不能挽救國家民族的危機。譬如宋代民氣的激昂，忠臣義士多以身殉國家，爲什麼不能以救國家的傾危呢？這由於人主闇弱，不知領導，任其挫抑，反信用奸邪，敗壞國事；明朝的亡國，並非無可用之民氣，亦非無可振奮之人心，不過繼續宋室「奸邪得志讒頰登用」的歷史發展，更以煽其

鬼饑，催速國家的滅亡，便是宋朝亡國一幕悲劇的重演。可以說：宋明的亡國，亡於一般士大夫之無氣節，阿附取容，今日曰師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雖有一二正人君子，也就無補於民族國家的危亡，不過於死生危難之際，一顯示其大節罷了。

從又一方面說：一個國家要培養優異的民族精神，使民族潛在的德性能發揚而光大，必須要造成一個偉大示範的中心力量。我們看「精神動員」的要求是什麼，就應該平心靜氣自己來思索一下：醉生夢死的生活改正了嗎？奮發蓬勃之朝氣養成了嗎？苟且偷生之習慣革除了嗎？自私自利之企圖打破了嗎？紛歧錯雜之思想糾正了嗎？要看一看自身，再看一看自身周圍的社會，就知道要使這種運動的發展普遍而深入，要使這種運動的收效偉大而實際：其一是「身教重於言教」，這要求精神動員的每一領導份子，在精神上行動上造成一個好的榜樣出來，以達到「正己化人」的目的。所謂「風俗之移易，繫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矣。」其二有一定之政策，尤貴有「守正不阿」之人行使其政策，持之以恆，終始弗渝，才能收到轉移風氣與挽救人心的實際效果。因此這一切的問題，都屬於政治節操的問題。

再拿外國來看，在這次世界大戰中已把德法兩大民族之民族性的優劣，充分暴露出來了。因為德國民族具有嚴肅、刻苦、沉着、勇邁的性格，能在戰敗後的二十餘年間，痛自砥礪，發奮圖強，不轉瞬已回復到大戰前夜的雄姿，重擊戰禍，造成席捲歐洲震撼全世界的怪局。相反的法國民族平昔之金迷紙醉

，怎能一旦忍受這悲壯嚴肅殘酷的戰爭生活，有誰不認定這次法蘭西民族的大敗創是一般國民耽於淫佚奢靡爲最根本的要素呢？固然一般人只覺得德意志民族具有優異的民族精神，而有今日的偉績，但不知其真正的原因，還是由於德國具有奉公守法忠誠職守之優良的吏治風尚，這也是屬於政治節操的問題。

老實說：當前一切問題的癥結，就是紀綱不振、政治風紀敗壞，有職責的人，沒有盡到它應盡的職責；明知義理之不可推却，而依違於權勢利祿，至袖手旁觀，視若無睹。明知違拂輿情，爲天下所指數，但爲一己之私利坦然行之而無所顧悸；同時一般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往往能知能言而不能行；就是在行的方面不能明白劃分一條界線出來，無氣節、無操守，不能如岳武穆所說的「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在今日一個最根本的問題，還不是政治節操的問題嗎？

我們對政治節操的正確認識。什麼是「政治節操」？從字義上說：節是氣節，操是操守，所以「政治節操」的簡明意義，就是政治上應經常保有一貫的志節行爲。我們看到政治混亂的迹像，特別是「錯雜徬徨、莫衷一是」。所有政爭的焦點，無非本身利害的衝突與失調而已。因此這一切問題的癥結，便是「政治風紀」的敗壞。雖然在根本國策上，任何人無可非議，苟無守正不阿之士執行其國策，必致形成一般無定見，朝是暮非，至於朝握手而夕操戈，造成政治上的動盪不安，更而懷着熾熱的政治支配慾

的人們，不惜逞其煽惑與挑撥的伎倆，製造紛歧，釀成事變；至有賣身投靠，出賣祖國，漢奸之不斷生長，貪污之風無法稍戢，馴至人格墮落，廉恥喪盡？這還算得是政治上的志節行爲嗎？

我們較深刻的去觀察各方面，無論是國內或國外，認爲一種險毒腐惡勢力的發展，好像波濤的洶湧，第一層層迎接上去，後浪催前浪，有什麼地方不爲這種惡浪所捲洗呢？第五縱隊遍佈了世界的任何角落，充滿了陰謀與無恥。就國內的局勢而言，這會給予我們不少沉痛的回憶，因爲歷年來的戰爭本應由最政治上缺乏一種互信的精神，對人的不信任，積存一種自是和自尊的心理，儘管國家危難到什麼程度，總在各方面作各自的打算，因此遇事也充滿了私意與偏見，這必然要引起一切無意味的爭論與磨擦，把所有力量都用在對人的上面；加以羣小操煽其間，弄到上面因循矜且，下面就肆無忌憚，各利用其優勢，以遂其傾險狡詐的手段，以爲這是失快所欲了。竟不知其所造成的結果，不過爲「親者所痛仇者所快」而已。如此步調之不齊一，分歧之不斷製造，怎能使國家走上政治的常軌呢？又怎能從狂寇兇殘攻掠之下獲得拯救呢？所以今日而講明「政治節操」，不僅有其必要，而且是有其嚴重性的。

從那裏才看得出政治上的志節行爲？這裏要求每一個從事於政治活動的人，自始至終要有什麼堅定而正確的信仰，抱持中實的正義的主張，不爲威逼利誘，雖至終其身不能實踐其主張，亦不致因困苦窮蹙而移易其心志。其次要求有不偏不倚的公正心腸，不阿私，不曲庇，不以喜怒爲憂愉，不以

好惡定刑賞，遇事對事不對人，以衆人的心爲心，以衆人的是非爲是非，以衆人的利益爲利益，以衆人的耳目爲耳目，自己心中不雜着絲毫私念，因爲一有私念，便不得不害天下之公了。再次要求有「從廉納善」直率坦白的誠懇態度，遇事不固執成見，而預存一種自是之見，以免造成一種急狃狹隘的行動，尤其遇事要有一種眞摯誠篤的精神，不去取巧，不圖規避，不計近功，不求速效，這樣才能從施政的政績上放出一線異彩來。因此我們對「政治節操」，不可看成單純片面的氣節問題。

「政治節操」是什麼，我們已獲得了明白的解答，因爲其中的涵義是極廣大的。從狹義方面說：是每一個政治家所恃爲依據的進退出處的準則，當然輕舉妄動，是關乎一生大節的。從廣義方面說：是規正一切政治行動上的道義準據，那便是無論朝野上下，均應有一個共同遵守的道義範疇，誰也不應逾越這一範疇而喪失其在道義上應履行的信約。因此我們要挽救當前國家民族的危機，鞏固國家的團結，以及擴張政府的效能，完全要視政治節操的振廢以爲斷言了。那麼今日我們處在「抗戰建國」的艱鉅進程中，就要樹立一個新時代的政治作風，掃除一切貪鄙自私、苟且因循的積習，而開創新的風氣。

如何去開創新的風氣，我們要開創新的風氣，就要具有開創的精神，而一反頑固保守的常態；因爲國家民族的危機的嚴重性，再不能令我們瞻徇不前了。我們自朝至夕談新作風，就應該冷靜地去思索：我們對人的態度，立身處世的根本大法，都會有點改變嗎？我們不會詐僞相尚、意氣用事，採取那裏一

套陳腐尖刻而呆板的方式嗎？我們怎樣去開創新的風氣呢？我們要抱定最直率坦白的態度，因為要融飢新的風氣，并不要去責備人家，只要求自己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因為無論從在朝或在野任何一方面的努力，都可以振起既死的人心，而開創新的風氣出來。

從執政的方面說：抱定一個最誠信的態度，能忠實執行其一貫的政策，守正不阿，終始弗渝，又為浮議所動。假使人人能盡忠職守，時時在求進步，事務的力求改進，機構的力求健全，賞罰的嚴明，用人的公正，始終為貫徹其一貫國策而努力：這何憚於各方面的牽制而瞻顧不前，又何懼於清議之指摘呢？同時可能影響於在野之士知所奮勉了：其一祛除其對政府忿怨的心理而轉變為同情政府的心理，其在野資格盡量來支持政府，這點支持力量的延續下去，便是國家絕大的進步。其二祛除其疑懼的心理而轉變為愛護政府，效忠於政府的熱忱，這樣不徵律於不可必的富貴，減少一切磨擦與爭奪，消滅一切陰謀與無恥，何況當着國家大難臨頭，有誰肯忍心害理作閹豬之爭呢？

從在野的方面說：更要具備一種對「國是」的誠信態度，同時要具有一種「行爲世則言爲世範」的立身處世的根本精神，不可隨意變更，也不可因環境遷就而放棄其主張，弄到賣身投靠，與世浮沉，天下還有什麼公理正義之可見呢？如果人人不為威逼，不為利誘，苟於斯時力能匡救，則盡力以赴之；如不能匡救，則宜遷迹山林，立德立言，以作來者忠義之氣，這樣可能影響於執政的人物知所警惕了；其

一由萬葉公理正義的心理轉變而爲敬畏輿論的心理，認爲論理之不容行，不敢貿然嘗試，雖欲粉飾飾，但公道自在人心——輿論既不可以金錢收買，復不能任性製造，戒慎恐懼而知天下後世公論法可畏了。其二由鄙薄士類的心理轉變而爲慕仰賢哲的心理，認爲天下之士，非能以一黃金躍於人前，白刃脅於人後，就可引火入穀的。苟不自檢束，而造成施政上的乖謬與偏廢，立能遭過在野人士的嚴厲抨擊，而形成局勢的動盪不安；同時以一個在野衆望所歸的領導人士的一言一動，具有旋乾轉坤的偉力。這樣「臨深履薄」有誰不兢兢業業以効忠於職守？又何患政治不修明，社會的秩序不安定，國家的權力不能集中呢？

這樣，一方面的努力，無形產生一種互相扶持與督責的力量出來，可以促成另一方面的覺悟與進步。現在有沒有這互相扶持相夾輔與督責的力量呢？敢說任何方面的努力，是不夠的；最大的缺欠，都是拋棄本身的一環，而在自己的周遭打圈子。雖然當前一致確認「精神動員」爲努力的目標，但大多數在空談，不務實際，因此天天在談精神動員的人，實際上在他本身精神是一天天頹唐了。又如我們天天在講行政效率，而實質上行政效率不僅不因此而增進，反在許多方面是在減退了；甚至弄到機構龐大不靈活，增厚其笨重性，反使其失去原來的作用，形成所謂「入見其人，清談于雲，出觀其政，是非混淆」的現象。究竟我們要從那裏去圖補救呢？這裏就要劃清一個界線，認清各自努力的方針，造成一個互

相扶持與督責的力量出來，有了這個力量，才能形成「精神動員」的領導中心，才可轉移社會的風氣。不如此，就只有一個空洞的口號而在人們面前閃躍，誰肯把督責放在自己的肩上，實際是責任不分明，在精神上大家都不會動員起來，不過挾此以責讓他人，又有誰肯反射自問而痛自悔罪呢？因此我們要提出「政治節操」這一課題，要求在朝在野的「士大夫」，各自檢束，各自振厲，才可以振起已死之人心，而挽回國家的劫運啊！

二 政治節操與民族道德

(一) 構成政治節操的道德條件

我在前面已經說明了「政治節操」的涵義，怎樣做到有氣節、有操守，怎樣是無氣節和無操守呢？這就是孔孟所說的狂狷與鄉原的分野了。孔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這就是說：「狂者」是敢言敢爲，富於進取精神的人，「狷者」爲有氣節有操守，不同流合污之人。所以朱子在語錄中對狂狷的解釋：

「問狂狷。集注云：善人胡爲亦不及狷者？曰：善人只循循自守，不會勇猛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責之以任道則不足。狷者雖非中道，然這般人終有筋骨，其志孤介，知善之可爲而爲之，知不善之不可爲而不爲，直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望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晚年磨來磨去，難得這般好底人，如狂狷尙可有爲之資，裁而歸之中道。且如孔門，只一個顏子如此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道衰微，人欲橫流，若不是剛介有脚跟底人，立定不佳。

什麼是鄉原呢？孟子對此更解釋得精闢獨到，他答萬章問說：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願行，行不願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購購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闕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這樣可見孔孟的根本精神，是重在節操了。但後世一般所謂假儒賤儒的士子們，誤於中庸寬厚之道，無黑白是非，以全軀保妻子爲念，尤其一般所謂曲學阿世的士大夫們，徒以儒術爲文好之具，以依違取寵爲立身處世之大法。如果見到守正不阿，傲骨嶙峋之士，則羣指爲浮藻，以爲氣質未醱，不足與言聖賢之道。所稱爲醇儒者，不過雍容養望，習爲稊稷兩可，而於孔孟發強剛毅之精神，反置之等閒。這真是孔子斥爲德之賊了。中國民族二千年來，卽病在此豈覺儒造成今日奄奄無生氣之奴性族類。在書會國藩先生有言：

「二三十年來，士大夫習於優容苟安，倡爲一種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風，兒有慷慨激昂以鳴不平者，則相與譏其後，以爲是不更事，輕淺而好自見。國藩昔廁六曹之目擊此等風味蓋已痛恨刺骨。」又說：

中國漢從宣有年，飽閱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羨望，與在下者輒熱和同之象，蓋已稔知之而慣習之，積不能平，乃變爲慷慨激烈，軒爽骯髒之手段，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癢牢不可破之習，而矯枉過正，或不免流入意氣之偏，以是屢蹈愆尤，盡譏取風，而仁人君子固不爲之以中庸之道，且當憐其有所激而矯之之苦衷也。（曾文正公書牘）

可以說：「政治節操」無論從那一方面的檢討，都已充分顯示其必要與重要性了。因爲中華民族五千年來的發展，雖然也會遭遇無數次嚴重的挫折與損傷，但未曾有過如今日創痛深的一天，因此這在目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條是亡國的路，陷中華民族於永遠奴隸牛馬的地位，將會使整個民族由尊嚴而淪落，一直向滅亡路上而大踏步前進。一條是民族復興的路，趁着這千載一時的良機，而努力建設一個三民主義的新國家，更而促進世界大同，奠定世界永久和平的強固基礎。那麼從現實的需要以及歷史的意義，都應該使我們急起直追，把復興民族國家艱鉅使命担當起來，爲了要完成這個艱鉅的使命，就非要講明「政治節操」不可。

我們不能空洞來講政治節操，究竟要拿什麼作爲政治節操的道德條件呢？如果不明白指出一個範圍，惟知矯枉過正，陷於孤立無助，終日僅供人的指摘與厭棄了，還談得上什麼移風易俗，來端正社會趨向以挽救人心呢？雖然我們應該具有一威武不屈，貧賤不移，富貴不在，大無畏的精神，但同時也應

該辨別「行爲世則言爲世範」的界限出來。就是說，我們要拿什麼道德條件作爲我們行動的準則呢？有人說，現在時代不同往昔了，我們的道德條件，應該有變遷而不應視爲一個死物，但是我們從那裏去找出新的道德標準呢？新的道德沒有建立起來，舊的道德又被摧毀無餘，則一個國家便沒有立國精神，自然國將不國了。近年以來爲了力矯此弊，而有新生活運動的積極提倡，新生活運動的內容，就是禮義廉恥，所以總裁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既張，國乃復興。」

但是在這嚴重局勢之下來講明「政治節操」，許多人都認爲是迂闊的，也許認爲這是不經之談，而梗阻在我人心頭的以爲死去了的民族優美德性，是否還有被保存的價值？是否還能重新振起其素來所繼承先民偉業而發揚光大呢？我們僅僅看到孔孟學說支配中國數千年的人心，阻遏了中國文化、社會、政治、經濟的向上發展，尤其是歷代專制帝王御用孔孟學說，以圖鞏固其統治地位，維持國內永久的和平，所以宋儒更發爲「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的謬說，而採殺孟子；「君之視臣如草芥，臣之視君如寇讐」的道理，更經過滿清「愚柔政策」的長期薰染，連夷夏之防也盡撤了，所以梁啟超先生尙爲滿清開脫而曰：「春秋之號夷狄與後世異，後世之號夷狄，謂其地與其種族，春秋之號夷狄，謂其政俗與其行事。」這就是千百年來一貫的奴儒思想，而我們今日所自爲的衣冠塗炭。然則我們先民保有什么優美德性，是否還有被保留與發揚光大的價值呢？

國父在民族主義第六講裏說：

「大凡一個國家所以能够強盛的原故，起初的時候，都是由於武力的發展，繼之以種種文化的發揚，便能成功。但是要維持民族和國家的長久地位，還有道德問題。……我們現在要恢復民族地位，除了大家聯合起來做成一個國族團體以外，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復起來，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後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圖恢復。……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這種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

我們國父不僅一語道破當時的人心，而且至今還有不少持着這種謬見的人，果真道德有什麼新舊嗎？譬如說到忠孝二字，一般人都認為是舊道德，但是不忠於君，而可以不忠於國，不忠於民族嗎？不忠於國，不忠於民族，便是漢奸，因此我們今日應對國家盡忠，對民族盡孝，豈能謂為舊而可以不遵守嗎？可以說，能够合乎行為之標準的一切道德，根本就無分新舊。所以今日而要闡揚「政治節操」，就要恢復民族固有道德。但是有許多人認為這種陳舊的民族道德，並沒有被保留的價值，更有人認為什麼

恢復民族固有道德這一套爛調，都是統治者拿來鞏固其統治秩序的一套法寶，因此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所以我說空言「挽頹風，救人心」的話，是無補時艱的。然則我們今日來唱言「恢復民族固有道德」，是否有其真確性呢？我說不僅有其真確性，而且還有其必要性與嚴重性，因為我們不要把「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個字的美德，去偏重在柔性的方面來看，如果抽出其中「成仁取義」的精髓，那便成爲罪惡了。這絕對是誤解的，不是叫我們講仁愛和平，而不去反抗異族的侵略，不是要我們講忠孝信義，而不去匡救君惡，正如孟子說的「聞誅一夫討矣，未聞弑君也。」我們要知道中華民族精神的遺產，尙沒有因今昔不同而喪失其價值與作用。

（二）恢復民族固有道德的功效

中華民族歷史上有過最輝煌的一頁，就是民族道德的發揚，我們要講明政治節操，就非要恢復民族固有道德不可，這是一個聯貫的問題。我們今天講舊道德，並不是提倡復古，而吮吸前人的餘唾。乃是針對國家民族當前的需要，當然不是一種柔化手段來陷人於輾熟無骨。總裁說：「我在考滿清三百年來歷屆的教育訓條，什麼仁義道德孝弟忠信都說盡，但是從不見他有特別注重拿禮義廉恥或氣節或節義這幾個字來教人的。認真的說，滿清所有的訓條，幾乎找不出這六個字，因爲這種亡國的教育，在中國

難推了三百年，結果使中國人，統統廉恥道喪，氣節掃地。——（見今後改進政治的略論）因此我們今日所要提倡的舊道德，就是講廉恥重氣節的革命道德。

我們從前一般人一般所認為的道德條件中，有許多是要被推翻成案的；但是廉恥道喪，為漢奸奴才賄賂官污吏而不足惜，正由其良心滅絕，陷溺已深，則吾人今日非振起已死之人心，不足以挽回國家之命運。因此總裁說：「我所講的禮，乃是合乎義理的禮，乃是有廉恥的禮，必須有廉恥，合義理的禮，然後才可以叫做禮！如果不要廉恥，向外國人三跪九叩首，那麼禮越多就沒有禮！這種禮，就是做漢奸做亡國奴的禮，不是有節義知廉恥的真正的禮！這些道理能明白，才能自尊自重，才能不至於降志辱身。但在今日而降志辱身的人之所行所為，實引為嚴重的問題了。」

古今來沒有廉恥的人，無事不可為，根本談不上氣節。所以顧亭林先生說：「禮義廉恥之中，恥尤為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忘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為國恥。」（日知錄卷一三）因此我們今日要救國家的傾危，就是砥礪廉恥：使人人知道為漢奸賣國賊之可恥，足以遺臭萬年，以粉碎其屈辱投降的迷夢。認為輕生重義之可貴，乃不惜捐棄私愛，掃除情慾以獻身國家。正如相梁華舟之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不若汝策也。汝

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說苑立節篇——這樣以舍義爲榮譽，背義爲恥辱，便可以造成旺盛的民氣，而蔚爲重廉恥講氣節的風尚了。

既然我們中國歷史上有過最輝煌的一頁，爲什麼在春秋戰國以迄漢初大大發展而普遍了崇廉偉大的民族精神，此後若斷若續，而變成歷史上不可洗雪的污點呢？以爲是培養這種優美德性的教育上的缺欠嗎？以爲辭旨深微而不能獲得一般人普遍的了解嗎？我認爲唯一的原因，是由於專制的流毒，——訓練，使與柔弱民氣的結果，使這種優美的士風受到中挫，——夭折，不能適當而普遍成長起來。所以培養民氣有精絕對必要的。因爲在今日要對付我們的強敵——日本帝國主義者，必須發揚民族性的特長及恢復民族固有道德。因此我們站在「政治節操」的基礎上，來檢討民族固有道德，更顯示出特殊重要的意義。——總說：「總理的三民主義之中心的基本原則，就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我們現在就「總理所提出的八德」來看：

首先要說忠孝，一般誤解忠孝的，不以爲效忠於君主，孝於父母，友於兄弟，這種三綱五常的倫理道德，是封建時代的產物，是維繫社會秩序的行爲準則，不僅不適用於今日，反足以阻滯社會的向上發展。殊不知把忠孝二字運用到現實社會發展的過程上來，便能成爲助長現社會經濟發展之有利條件。——國父說：「現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爲到了民國，便可以不要忠孝，以爲從前講忠孝，是對於舊的」

所謂忠君，現在民國沒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這種理論，實在是誤解。因為在國家之內，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說忠字可以不要，試問我們有沒有國呢？我們的忠字可不可以用於國呢？我們到現在說忠於君，固然是不可以，說忠於民是可不可以呢？忠於事又是可不可以呢？我們做一件事，總要始終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犧牲，亦所不惜，這便是忠。所以古人講忠字，推到極點便是一個死。「現在一般人都缺乏對忠字的認識，不能忠於國家，乃至有出賣國家出賣民族之漢奸傀儡之不斷出現；不能忠於職守，乃至倚權怙勢，憑藉其地位，時刻在不斷作自私自利企圖的打算。因此對忠字沒有一個真誠的認識，也就沒有人拿「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為行動的最高準繩。至於「孝」的美德，是構成中國社會的特質，又是否適於構成為今日的道德標準呢？這是從大學中所說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貫道理而來的，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齊家而推到平天下，所以在家庭能孝，而於國家必定忠誠，所以古人有「忠臣出於孝子之門」的說法，同時也能移孝作忠，因此這種正心誠意修身齊家的道理，都屬於道德的範圍，是應該被保存的。

次是仁愛，仁愛之應用於政治節操上，表現在政治的行爲上，特別顯示其重要，所謂「仁民愛物」，更應視為一個施政的基本原理。我們覺得世界文化無論進展到什麼程度，但是由官治而轉為民治的過程，就非有賢明的統治者抱定「以天地為心，為生民立命」的主旨，而遂行其不忍人之政不可。因此

相反的而沒有「仁民愛物」的懷抱，則必造成貪污專橫暴虐的政治。所謂施政的政績，不過等於一羣罪惡，那麼造成的結果：其一、施政不能投合於一般人民的需要，造成人民與政府的隔膜，就無法消除人民對政府的仇怨，人民積怨之深，遂無形喪失其統治的能效了。其二、一切施政不能得到人民的同情與擁護，政令的推行，更得不着社會上大量的幫助，反形成朝野間的對立，而導致人民嚴厲的抨擊與罪責，遂致由政治上的動盪不安，而使國家的根本動搖了。其三、沒有仁愛的美德，一般以刻險陰毒用事，而使政治的角逐愈趨於尖銳化，吏治永無澄清之望了。究竟我們看到政治上有沒有仁愛的美德存在呢？我總覺得這種道德表現的力量是不夠的，不然就很少發見這種濫權濫職的行爲了。所以仁愛的美德，是應該要被保存而發揚光大的。

其次是信義，信義是中國人一般通常具有的美德。譬如商場交易，只憑簡單的一言爲定，用不着什麼合同，一般的借貸，也用不着什麼契約，便有很大的信用；又如指腹爲婚，朋友間之相互倚賴幫助，更有許多代友復仇，撫人遺孤，所謂受人之託，終人之事，都是建築在信義的美德上。因此中國民族有了一貫信義的美德，所以在國交上爲了講信義不得不濟弱扶傾，有時甯肯犧牲自己國家的利益，而支持他國的獨立與生存。那麼在內政上，一切的施政均以大信爲本，慎重發令，令出必行，更有商鞅徙木以立信，雖然是一時權詐的作用，但可知政府是要取得民衆的信賴，才能擴張其統治的能效而樹立其威

信啦。我們把信義二字分開來解釋，信是直然諾，說得出的就做得出來，現在一般人的道術，就是只聽坐而實不能起而行，甚至食言而肥，那還有什麼信義之可言。義是義俠，能見義勇為，這路不平，拔刀相助，更由此而推廣其意義，那就是孟子「捨身取義」的大道理。現在能看得到什麼義烈的行爲呢？除了看到成仁取義的抗戰將士之外，一般想偷偷摸摸發國難財的人，當然談不上信義。現在我們國家到了這樣嚴重的生死關頭，就應該保存信義的美德，才能挽救國家的危亡。這裏更可以肯定說一句，政治上一切不道德的行爲，大多是由於不講信義而起的。如果不講信義，又談得上什麼政治節操！

再次要講到的是和平的美德，因為中國民族是世界上一個最和平的民族，所以我們國父當臨終彌留的時候，還在那裏嗚咽着「和平」奮鬥。救中國，這裏所謂和平，不是汪逆精衛跟隨日本人的槍尖所指，砲火毀滅之下所高唱的「和平」，爲什麼奮鬥救中國還需要和平呢？我們國父「實是遺囑」政治的，他看清了北洋軍閥之不難肅除，惟恐革命的本身轉變爲一種暴力，所以他說：「中國人應平平和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論到個人便重謙讓，論到政治，便說不嗜殺人者能治之。和外國人便有夫夫的不同，所以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我們要知道中國行了幾千年的專制政治，但尚殘存始皇的專制，直接危害人民的生存，所謂「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以備促其滅亡外，至於歷代的專

主尤其是開創的君主所造成的政治，大都對於人民取寬大態度，因為中國是一個酷愛和平的民族，所受專制政治的毒害，也不似歐洲人受到如何殘酷專制政治的那麼痛苦。可以說：和平的美德，還是由於仁愛的根本精神而生長出來的。現在我們的抗戰，是爲了民族的生存、國家的獨立，更爲了世界的永久和平。當前我們要怎樣去掃除國內動盪不安的局勢呢？那便需要一致養成和平的美德，才能奠定長遠平安的基礎。

道德是行爲的標準，只要這一切道德條件能符合於今日的需要，我們就應該視爲行動的最高準繩。但是要怎樣使這種道德感染力，能成爲吾人內心制約的力量呢？如果不能使這種道德條件成爲內心的制約力量，那麼，人的行爲往往不能以理智來戰勝私慾的發展，這就是要養成一種自爲控制的功夫，能從實踐的過程中，認真體貼。譬如說地位不安適，一個人在鬱鬱不得志的時候，不免有一種憤懣不平之氣，每於有意無意之間流露出來，爲什麼先賢能做到逆來順受而我們則反是呢？因此引起人的憂鬱和形成地位的爭奪，各機關人事的不斷急劇變動，這都是政治不安的表現。如果我們能瞭解一個人的誠信未獲得人充分認識之前，不可強爲進取，亦不可急於求知，同時也要瞭解功利思想毒禍人心之深，我們應該把他改正過來，這樣就沒有憤懣不平之氣了。又如我們做人能够做到「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的境界，就非有長期的修養與磨鍊不可，所謂「丹成九轉心火候不到，那能望於一動心忍性增益壽

所不能呢！沒有動心忍性的修養，便不能做到自爲控制的功夫——負責任，不貪污，又何能望於一般人之不濫權濫職呢！因此我們有了這一切優美的道德條件，還要有篤信力行始終不渝的毅力。

(三) 民族精神的發揚

中華民族是最重氣節講廉恥而勇武義俠的民族，先民基此表彰而出的一貫志節行爲，便是民族精神之所寄託，也就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一貫的立國精神。這一切志節行爲，不足以爲我們的矜式嗎？這種崇高的民族精神，還不應該去發揚光大嗎？

中華民族是歷史最悠久文化最深遠的偉大民族，雖然有不少污點佔據了歷史的一頁，這都屬於民族精神振作與衰頹的問題，民族正氣發揚與否的問題。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什麼？中華民族的根本精神，完全建築在「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基礎上，他的涵義最豐富，抱負最偉大，意志最崇高，而且具有從容赴義臨難死節凜凜烈烈的氣概。這種「鬱河嶽而生色結風雷以爲魂」的偉大精神，是中華民族成長五千年來的結晶，在今日實有「重鑄黃魂」的必要了。

中國史上曾有一個長時期與異族爭生存，如果民族性沒有特殊優異的地方，不然在優勝劣敗的途程中，早被淘汰了，何幸自秦漢以來還能造成歷史上的偉烈奇蹟呢？固然儒家的思想，是重在保守的

，然而有一種成仁取義的精髓，滲透在整個民族的血液裏。我們從孔子說：「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和孟子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的兩段話看來，可知中華民族有一種生存上必要的道義的要素存在，我們來看文天祥的正氣歌所援引這一切悲壯而凜烈的行事，很可以代表中華民族成仁取義的精神。我們讀「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的幾句話，可知他執義不屈，從容就義凜凜烈烈的節概了。當然這種浩然的精神，是有其崇高文化的長期孕習而成長出來的，亦為燦爛史實所保有的民族性的優點。

春秋戰國時代，是中華民族與異族競爭最激烈的時代，也就是中國歷史文化發展的最輝煌的時代。可以說：中華民族的精神，在這一時代要算最崇高而偉大的。我們看到當時優美的德性，其唯一的原則，在於熱烈的犧牲自己以徇國家，徇名譽，徇朋友，其忠愛、信義、勇俠、節烈的精神，已遍及於大江南北，所以江上漁父、溧陽女子，亦不得不為這種輕生重義的風尚所感染了。因此我們不要頹廢而喪失民族的自信力。我們讀梁任公先生著「中國之武士道」一書，僅就先秦時代就有義士七十餘人。概括起來，別為數端：「國家重於生命，朋友重於生命，職守重於生命，諾言重於生命，恩仇重於生命，名譽重於生命，道義重於生命。」所以任公先生讀著說：「橫絕四海，結風雷以為魂。壁立萬仞，鬱河嶽而

生色，以觀彼日本所自修許曰武士道者，武士道者，何遽不遠耶！何遽不遠耶！」所以我們今日而欲砥礪名節，非要發揚我先民的優美德性不可。

固然文天祥的殉國，是發於儒家「成仁取義」的精神，然而還能看到其他的行事，足以代表此種偉大的精神嗎？我們拿正氣歌的內容來看，所謂「在齊太史簡，在魯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這一切行事乃鑄成了「是氣所磅礴，凜凜萬古存」的偉力，而代表了國家民族的正氣，因爲這都確立在「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目標之上，不顧本身利害，捨棄個人利益，在今日這一切悲壯而凜烈的行事，還不足爲我們取法嗎？以近者論，我們看 總裁西安的被劫，因爲有了這種至剛至大的精神，更成就了他的偉大，所以在離開西安前對張揚的訓話中說：「如果我趨避危險，屈服於我的部下的暴力之下，則我之正氣以及我所代表國家的正氣，將摧毀無遺。無論個人或國家喪失正氣，即等於滅亡。爲維護我一再向民衆誡誡的道德，我準備作任何的犧牲。如果不實行我的主張，則我的部下和全國民衆，將無所適從而國將不國了。」像這樣道德上偉大的勇氣，還不是由於我先民保有的優美德性所感染以成的嗎？

可以說，先民一般的志節行爲，都是基於「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最高原則而發揚出來的。在外邊

當前國步艱難的今天，我們每一個人的行動，都應該有所取法。先民這一切足以爲我們矜式的崇高的志節行爲，正辭舉八端以言：

一、其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盡瘁國事的堅決毅力：我們要對民族盡孝，對國家盡忠，非具有與日俱進的帝國主義者不兩立的堅決意志不可。我們努力於全民族的自由與解放，即令竭盡畢身精力，猶恐不濟，必有待於後死者的努力，才能完成救國家的任務。所以不要氣餒，不要頹喪，必待死後才可以放棄時代所賦予的使命；我們更要求每一個中華民族兒女們繼起其工作。如果沒有繼起者，即令我們本身作了文天祥、陸秀夫、史可法，不過成功了歷史上的粧飾品，這於中華民族的死生存亡，是絲毫無補益的。

二、要有一執義不屈不成功便成仁的激烈節慨，中華民族的每一份子應以作亡國賊俘爲奇恥大辱。縱令被執或身爲俘虜，不能造成文天祥從容殉國引頸就戮的仁至義盡慷慨的史實，也要有蘇武身被羈囚嚼雪吞氈容忍以全大節的節慨。奧佩孚將軍不爲威逼，不爲利誘，以敵被寇就於德寇氣腫之手，正足以顯示其民族正氣了。

三、要有一容忍爲國亡的寬大胸懷；我們隨時隨地要以民族國家利益爲中心，民族國家的利益，高於黨派的利益，那麼臨到國破家亡的悲慘境遇，還容我們講氣節成見嗎？正如說：「國破家亡，

外禦其侮」，「多麼不好比日本鬼子強得多」——馮副委員長語。所以我們要有廉頗藺相如容忍爲國解嫌釋疑的寬大胸懷。

四、扶持正氣，糾正惡風，以造成健全而真實的輿論：輿論界的職責，便是對於敗風惡俗能痛下砒砒，對於一切不當於義理的行爲，能予以嚴厲的抨擊，以盡其口誅筆伐的最大功用。如宋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奮不顧身，以明李綱之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至數千萬，可見是非公論之可畏了。

五、具有熱烈豐富的同情心，以扶助善類，排擊奸惡，造成勇於赴義的風氣。社會的是非不明，見善而不能獎，見惡而不能去，便造成「是非混淆，正義磨滅」的現象。如漢楊震之激濁揚清，傾動關中。我們要具有熱烈豐富的同情心，熱烈而助贊人的成功，愛護善類，並扶助其成長，徒然一種內心的憐惜，只有助長奸惡的惡餓的。我們覺得一種原始人，絕未受高尚文化的薰陶，反而見到道路不平，還能換臂而起，拔刀相助呢！因此我們要正色不撓，不要禍福太明，以嚴肅緊張的精神，予貪殘腐惡份子以無情的打擊。

六、摒除安逸，以偷生爲辱而養成勇健的風尚。如樊噲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終軍自願受長纜，必羅南越王而致之闕下。馬援請擊烏桓而曰：「方今匈奴烏桓尙擾北邊，欲請自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堂中耶！」吾人今日捍禦外患，須以馳死沙場

爲光榮，以羈虜酋爲職責，自非養成勇健風尚不可。

七、具有清操自守的素志，以砥礪廉隅造成剛健廉明優美的士風。現在一致缺乏道義上內心裁制的力量，挪揄於高貴的物質生活，不能清操自守，只表現得貪鄙自私的腐蝕行爲。我們應該一反常道，發揚先民刻苦堅貞儉樸的素行，要有勇於任事的毅力，不怕嫌怨，不存畏葸，遇事顧全大局，不懷忿怨，不存褊激，捨棄個人的利益而以民族國家的利益爲利益，更要有從心所欲不踰民族利益之矩的現代「民族意識」，造成剛健廉明的優美的士風。

八、要有抗拒強暴，臨死不辱，至剛至大的精神。我們要了解一般專橫拔扈之徒所造成的惡氛圍，貽害於民族國家的前途至爲顯著，我們無時無刻不與這種腐惡勢力相搏鬥。所以我們要具有張巡顏杲卿抗拒強暴，臨死不辱至剛至大的精神。

這裏值得注意的，雖然我們民族的固有道德造成了優美的士風，但在某一朝代中，這種優美士風的發展，只能看成一種暫時而僅有的現象，所以歷史上亂的日子多而治的日子不常見，也成爲了一個主要的因素。然則怎樣去培養這種優美的士風呢？是不是這種民族性的特長及固有的美德尚有被發揚光大的可能呢？中國士氣不振，道德墮落，已經是不可掩蓋的事實。其一由於一般人禍福太明，使善善惡惡不能昭然若揭，至今社會上還沒有人能担任這種激濁揚清的工作的勇氣。其二當着嚴重敵國外患而成長的

民族精神，本身雖茁壯，也有些經不起狂風暴雨的摧擊，我們應該加倍愛護，用力灌溉，這就是說我們朝野應該一致去扶助善類的成長，因為我們今日要從敗殘士風的廢墟中而使茁壯的民族精神發育成長起來，是一向極艱難的事業。這裏我們也不要認定舊道德只能適應於舊時代的需要，我們還要大聲疾呼：「恢復民族固有道德」，因為他不會使現代民族精神的成長起着參雜不純的作用出來，而他的助力，更能使現代的民族精神起着一種強烈的興奮作用。我們不要浮躁、淺識、悲觀、游移、喪失民族的自信力，而應該努力於民族正氣的發揚，以奠立民族復興的強固的「精神堡壘」。

三 歷史的回顧

(一) 中國歷史發展的主要因素

一個民族的成長和國家的發展，是循着歷史的陳迹而蛻化演變下來的，所以社會的關係歷史的條件，都成爲我們解決問題的重要判斷資料。我們基於這個原理，拿什麼來決定民族國家的命運呢？什麼是構成歷史的主要因素？我們要把頭腦冷靜下來，雖然我不是民族敗北主義者，喪失了民族的自信力；但我們要把一個民族立國的精神力和物質力扣算起來，應該感覺到什麼是空虛，至於脆弱無力。地處環堵和自然的條件，是立國的要素，但是近百年來產業的發展，資本的集中，經濟戰爭的尖銳，已衝潰任何閉關自守的農村經濟的堤圍了，這已經充分證明日本帝國主義者兇殘的進攻，不是單純讓武士聽者好大喜功所能一手造成的。我們要應付這個危難局勢，雖然並不感覺得束手無策，但是國家組織力的薄弱，一般民衆認識的模糊，而不能樹立一個堅確的信心與互信力，應該是不容諱飾的。我們進一步想，日本有萬世一系的天皇，爲什麼在中國只有換朝更代的一頁呢？這是有其人爲的條件與道德因果律存在的。現在我們已臨到國亡家破的悲慘命運了，應該反求諸己，宋明的亡國，是否足以爲我們的殷鑒？我們認

清了這一切，就知道構成歷史的主要因素了。換言之，一般士風振作與萎靡，便能影響於民族國家的生存與安危，同時由此而知政治節操弛張的所在啦。

中國社會好像是一個謎，數千年來並沒有什麼大的變動，簡直等於一個模型，在那裏開鑄歷史上陳腐一頁的一頁啊。他們一步一步追崇古人，幾個開創或中興的君主和幾個賢明的宰輔，都成爲歷史上的典型人物。秦始皇、劉季、劉秀、李世民、朱元璋，他們雖然造成歷史上許多次的功績，同時也由於他們一手製造了不少的罪惡；在性格上，朱元璋酷肖劉季一種猜嫌、疑忌、殘忍、刻薄的習性，李世民又酷肖似劉秀一種坦白、誠信的態度。李世民看到漢武帝勤邊事，務遠略之不竟全功；迄至晚年而有輪臺之詔，乃使他開邊拓土的遠圖而無形中沮了。然而他畢竟是可兒，醉心於文景之治，也就造成了「貞觀之治」的偉績，奠下唐室「國祚綿綿」的胚基。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無論劉秀、李世民、楊堅、朱元璋，……他們都有一個共同具備的信念：其一認清儒者階級爲安定社會的定心力，雖然漢高帝輕士慢儒，當倨見鄙食其而一聞利害之說，便不得不改容相謝了。叔孫通的功績，不在定朝儀而在引進儒生，豈可看成「馬上得天下」嗎？其二能投合一般人民的需要，韓信登壇拜將之說，是最能洞明利害形勢的，也就成爲換奪政權爭取領導的簡明寶筏。正如劉先生說：「彼以殘我以仁」，爭取民心向背爲第一要義，而不專在強力之發揚了。我們又從許多賢明宰輔中，認爲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其大

藹然，可推爲第一流賢相，他如蕭何、曹參以至裴度，不僅要求有治國平天下的本領，還要有全身保家的明敏智術，這在歷史上都成爲了典型的人物。

「儒者階級成爲社會的定心力」，這句話大致上是不甚錯謬的。中國社會裏面，雖然沒有顯著的階級壁壘，但是浮現在社會上一羣坐食消閒以讀書致仕的士大夫們，以爭逐接濟爲終生職業；所謂「不北走胡南走越」，這在秦漢以前，蘇秦張儀鼓如簧之舌，已大大顯示其權威了。因此平原、孟嘗、信陵、春申之流，爭致賓客，以鞏固其國家的地位。好的地方，布衣可以致卿相，不會造成絕對懸殊異階的階級政治，雖然也得看成統治與被統治的兩面；不好的地方，這一羣羣讀書致仕的士子們，爭逐鑽營之不遑已意，不得不形成「朋黨比周」的現象，互相標榜，各立門戶，以致傾軋攻訐排擠，無所不用其極，乃至社會上均呈現動盪不安。如有把這種動盪不安的形成，來下一個肯定的界說，這便是「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了；所以道長道消，成爲了治亂興亡的機軸，因爲歷代政治變亂，是起於治者階級本身的。雖然也曾由於政治不良，天災流行，釀成了民間一番大的騷動，如赤眉、黃巾、閻獸之亂，佔據了歷史上重要的一頁；然而李闖背後主持的牛金星，還是一個不第秀才。我們去細加體認，爲什麼政治上的變亂會不斷發生呢？這便由於治者階級本身利益之失其平衡，也由於忠奸誠僞之相生相因以相消長了。我們知道許多宗室、藩鎮、外戚、閹宦相爲禍亂的事實，會導演出「換朝

更代」不少的例證出來，也因為治亂興亡循環演變陷民族國家於長期的睡眠狀態。

這裏我們從歷史上可以看得出，許多明君賢相，無時無刻不在爲究先代的得失，所謂「治生於亂，亂生於治」，便是從紛亂中奠下強固的建國基礎：其一中心領導力量的形成，一面軍事上的勝利，遏止了野心家縱恣自雄的割據企圖。另一面是人心歸附，人材集中，野心家縱欲爲亂亦失所憑藉了。秦漢以來，「一般謀國者，惟「強幹弱枝」之是務，這不僅消弭叛亂，而且增強政治機能爲其最大功用，用人也得「到適當的調和了。我們又看到中央統治機構的健全，才能握住用人行政賞罰之天柄，不然大權下移，各自爲政，便弄到天下紛紛擾擾了。因爲局勢一經混亂，人心洶洶，誰都具有一種「妄自尊大」的心態，尤其一般士子們，無所適從，更不知鹿死誰手，乃不得不妄自尊大，各爲其主，稱帝稱王，製造出幾段以逞的戰禍來，這是互爲因果以濟其奸而成其惡的。其二民生的安定，獲得了休養生息的機會。這一面促成政治的革新，掃除歷代相承的弊風，便無形減輕對人民的剝削與榨取，故省刑薄賦，便足以厭衆安生民之望了。另一方面是給予社會一個安甯的保障，所謂天災匪禍的防範與救濟，使人民毋失安居樂業的常軌。司馬光責讓王安石的信中說：「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姓各安其職，委任而責備勤。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歛。」如此民生安定，戰禍不見，賢不肖各得其所，這就是歷史上所昭美的太平盛世了。

到什麼時候才會亂呢？許多人都懷於「開創易守成難」的訓教，無時不在作長治久安的打算，而亂的種子也就在這裏胚胎了：因為承平既久，一般士夫階級養尊處優，習於偷惰安逸，只充分表現其虛榮苟安的心理，乃專而集中於內在利害的衝突，傾軋排擠，以致設法構陷羅織，動輒大獄，更而窮極奢侈，道路側目，便造成朝野間水火不能相容之勢，同時表現得政治特別混亂，一般興做之臣，對人民雖懷不斷的橫征暴斂，以至民生凋敝，土匪叢起；尤其是廉恥喪盡，是非變亂，便弄到天下大亂了。許多明君賢相，看中了這十病源，還能對症下藥以謀補救，遂使將亂既亂之局而導入治的常軌，所以歷史上更可等到許多扶危救傾的偉績來。假使這時不從政治的努力上，以謀人民生活的改善，以適應一般需要，反而具備一種忿狹隘的心理，以為壓榨屠戮可以廣應當前的禍亂，殊不知愈壓抑而愈顛覆，而重陷於支離破碎的殘局。雖然有時賴着整風承旨的人們以嚴刑峻法獲得些微鎮壓的效果，但是經過這一番大的創痛之後，人才凋敝，民生日形疾苦，造成了如水益深如火益熱的嚴重局勢。從此天下土崩瓦解，然後驟之而起，又怎能以善其後呢？其禍乃不在於一換朝更代與而已。

這裏我們可以把治亂相生的道理排列兩個公式表示出來：

其二 由亂政治的歷程

人才集中力量集中
——
刷新政治安定社會
(內戰的大停與) + 軍權的統一 (即平亂) + 中央統治機構的建立 (正名號) = 治

其二 由治反亂的歷程：

（社會安定）——人才萎靡——內在利害衝突——新起點動亂大獄——
（國家富強）——亂——小人得志是非變亂

我們知道這裏所謂治亂的相生相因，成爲了一個「換朝更代」循環演變的鐵則，自秦漢而降的史實，便是這種翻來覆去的記載，一般不會努力於國勢的向上發展，民族社會福利的增進，幾個有爲開創的君主，僅止於保守原有的疆域而已，以朱元璋之雄才偉略，邊患未嘗一日稍靖，而不會殲滅胡虜於漠北塞外，其他柔弱的嗣君，便見得惴惴不能自保，乃至覆宗絕祀國亡身死了。爲什麼中華民族之長此奄奄無生氣而處於睡眠的狀態中呢？地理環境和自然條件，還不是其中主要的原因，最根本不過的原因，是由於秦始皇遺毒下來一貫柔弱民氣的結果。許多人對歷史上有一種錯誤的認識，他們以爲爭食的人多了，人才棄了，便會引起政治上的變亂，以至土匪蜂起；到了長期內戰屠殺的結果，爭食的人少了，人才也希罕了，天下自然太平。他們根本忽視了致亂的根源，不在於人才棄多，而在於用人之失其平衡，不在於人民之馴服，而在士風之萎靡不振。如果認爲殺戮是彌亂的唯一手段，那麼黃巢、李闌、張獻忠之流，又從那裏以定其功罪呢？

（二）歷代專制帝王的愚柔政策

中國歷史「換朝更代」的發展，便成就了「臥榻之旁，不容他人鼾睡」——彼可取而代之」的兩重心。理打迴旋，自己成功了「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却又懼怕人家起來攘奪，乃不得不誘愚其民，所謂「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殺功臣，誅豪俊，以斷喪元氣，動搖國家根本，而開中國民族憂慮不兢之漸了。許多人都歸罪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孟的愚民政策，而不知道家之流所關發的愚民政策，更爲陰險鋒利，專以居中持衡，以役使衆蠢爲能事，名爲無爲其實無所不爲。老子說：「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淮南子道應訓云：

「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鬥爭不已，爲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間也。夫未得獸者，惟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惟恐傷肉之多也。王欲持久之，則塞民於窵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耆而載之木，解其劍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著，高識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竿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實，厚葬久喪以重其家，舍殊鱗鱗綸組以貪其財，深堅高墻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勿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上面的這段話，是淮南子假託之詞，因爲以悍急敷政教民以駁的太公，絕不會有這種柔弱民氣的作

法，但也可知道家這一類議論，影響於後世之大了。黃老一變而為名法，所謂商鞅、韓非、申不害之徒，專以弱民強宗為主，慘毒少恩，無以復加。在當時秦為任法的國家，商鞅之後，繼之以李斯、趙高，輔始皇，胡亥而虐用其民，繁刑嚴誅，吏治刻深，殘賊生民。迄後漢文帝，崇黃老，景武復尚法，所謂「夜半前席」，但問鬼神，繡衣執法，動至萬千。我中華民族勇武義俠之民族精神，於以消磨蕩淨，後來儒家而受道家學說的影響，根本也起了質的變化，可見以學術而殺天下後世了。

中華民族本來是歷史最悠久文化最崇高的民族，這絕對不是一般人所目為的「東亞病夫」，然而歷代專制帝王本其一貫「一人強而衆人皆弱」的變遷政策，乃不惜橫踐陸陸屠戮，誅鋤士類，壓抑民氣，而使剛健勇武的民族一變為柔靡不振的民族。當秦始皇兼併六國的時候，以為長治久安，非要肅清這批奔走游說之士不可，如是焚書坑儒，以鉗天下之口，又恐六國苗裔起而復國，乃殺豪俊，墮名城，收天下之兵，聚諸咸陽，銷鋒鑄鈍，以弱天下之民，使出不敢彎弓而報怨，這以為可以完成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但至趙高弄權以廢秦二世的時候，陳勝吳廣之徒，乃羣起揭竿而亡秦，而且項羽燒秦三千子弟，橫橫天下，曾不旋踵秦儒子弟束手受縛而國亡族滅了。漢高繼秦而君天下，看到始皇愚民弱民的學說太過迂拙，致使天下離心離德，無復忠君愛國之思，乃使叔孫通定朝儀，徵用儒生，以權其便僻營柔者而登用之，所以魯兩生不肯行而對叔孫通說：「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吾不忍為公所為。」

行？公往矣？毋汗我？」可見當時所徵用者，多係寡廉鮮恥善詔工媚之輩，久之習與性成，使天下之士，靡然向風，自無從以論名節，士氣便日見衰頹了。

劉季起自布衣奄有天下，惟恐其臣下存着「取而代之」的心理，更慮他的子孫不能保有天下，乃大肆殺戮功臣，功臣各不自保，如英布、彭越、韓信諸人，相繼見誅了；人懷恐懼，而迫得韓王信出降匈奴，以召我族投降異族之奇恥。這樣任何君主都抄襲了始皇愚民弱民的陳法，雖在實行上有巧拙不同，功效各異，但是我醇厚優美的士風便受到激盪，不斷起着質的變化，因此每當政治逆流襲擊的時候，民氣便受到嚴重的摧抑。可以說：炎漢以來，無日不以誅勸士類、壓抑民氣是務。較之始皇還更變本加厲，所以景武之間，大誅游俠，如郭解、酈孟之徒，悉被誅勸，一般酷吏如張湯、趙禹、鄧通、杜周之輩，望風承旨，專以誅殺豪傑，刻礫強宗爲務，每一決獄，室連坐千餘家，流血十餘里，民氣摧殘，實無以復加了。然而公孫弘主父偃之輩，猶恐誅勸之不見徹底，乃妄引經義，文好言，而實藉其一棍功臣家及豪傑富人於諸陵，以強幹弱枝的詭謀。此種政策的謬誤，在王船山先生讀通鑑論內中說：

「富豪大族之所以強者，因其地也；諸州非渤海魚鹽之利，不足以強；屈昭景非雲夢澤葦之資，不足以強，世家非姻婭之盛，朋友之合，小民之相比而相親，不足以強；非其田里，違其宗黨，其所便，拂其所習，羈族寓食於關中之土著，不十年而淫事已落，氣釐沮喪。蕭子植云：『客子常樂』」

人言曰：漢人者常能自強，似爲國強耶？固不如休息餘民而生聚之也。嗚呼！民尚可徙也，會其難止而移其風俗，可使強也。漢傑大族，摧折靡殘而日以衰，衆失業，無能之人於戰敗之下，弱則強而強則弱，豈有幸乎？而當時之爲慮甚矣！

這樣交漢繼統以來，誅劔剪滅柔服民衆的結果，在漢高本身頻年征討，而專在用力對內，已無接除外患的遠圖，弄到自登之國，更感覺到捍禦外侮之無力，那麼最羞辱於我民族光榮史實的，要算漢高採納漢教和親之議而廢異族無厭之求，不入寇便求和親。雖然漢高晚年省悟而爲大風之歌，但已悔教無及？有誰與保衛疆土呢？一般士大夫之稍有氣節者不願遷拔於朝，所謂便辭着柔之士，惟以阿諛逢迎爲主，所以當世儒生力主和親，以爲自身懦弱無能，只求相安於無事，爲保全身家計，不得不以屈辱教人主，至於喪失國體，貽害民族，便不遑計及。漢武帝時，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作色曰：吾使生作一郡，能無使虜人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障間山自度障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一因此武帝以其雄才大略，志逐胡虜，當時名將衛青、李去病出塞萬里，追斬無前，遂令大宛投首，單于稱兒，封狼居胥山，築受降城，可謂國勢一振了。但爲什麼大功不竟，根本不能接絕外患呢？這便是舉國造成一致苟且柔靡的風氣，與一師則曰好大喜功，築一城則曰務民爲財，弄到舉世惶惶不安，這就是愚民弱民的結果。

同時柔弱異氣，推臻士類，昇到人民救死不暇。所謂正人君子，不過止於本身不為惡而已。其立身於朝者，也不過雅俗鑒定，形成一種不黑不白的脆弱的心理。既無由顯示其立身的大節，雖有忠君愛國的思想呢！那麼遇事只求苟安，保全軀體妻子而已。至於不肖之士大夫，惟在如何求其顯達榮華，以好言，動鬼神，如何能邀得主子的歡心，更進而如何去左右朝政以圖面其出也的地位，以致終相繼而托，排斥正士，杜絕言路，引進奸邪，箝其耳目，天下靡然向風，無復氣節可言了。抑此表現於政治的動態上，所謂廢立，清君側，都不過是正奉守舊黨毒的無條件的。其毒雖知其後，擅其才智，乃使這種毒作劇之局面的發展達到頂點，這時不僅清君側無人，而且新莽之世，上書頌莽功德者幾近四千萬人，果天下而入於家康無恥之途，怎能以政治修明據絕外患呢？那麼王莽本身也於不知不覺之而而葬身於那混濁局勢中了。光武中興，看到當時一般士大夫之其廉鮮恥，乃曾禁節節，數厲名賢，於是廉潔者尤能徵用事段，而風氣為之一變，所以趙甄北說：

自古取國難，取政，刑罰，修德，以養氣相角，一氣孤行，能為人所不取為。世其廉者平。其後有高，田叔，朱家，郭解，解，物人刻已，然語不欺，以立節節之訓，至東漢時，其風益盛。其廉者時，其廉者，必探名譽，凡可以得名者，必力赴之，好為節節。而其大體者，數以萬計。其廉者，必探名譽，凡可以得名者，必力赴之，好為節節。而其大體者，數以萬計。其廉者，必探名譽，凡可以得名者，必力赴之，好為節節。而其大體者，數以萬計。

值斧鑕上書請收固戶。蘇武被戮，故椽梅匡守護其尸不去，由是皆顯名。五種爲衛相，善門下吏孫斌，種以劾宦官單超見子匡，坐徙朔方，朔方太守董振，乃絕外。一知種往必被害，乃迫及種於途，格殺送吏，與種俱逃，以脫其禍。一此盡力於所事以著其忠義者也。傅奕即舉將殺，卽棄官行服。李恂爲太守李鴻功曹，而州辟恂爲從事，會鴻卒，恂不離州命，而送鴻喪歸葬，持喪三年。一此感知遇之恩而服制從厚者也。一又有以讓爵爲高者，西漢時，韋賢卒，子元成應襲爵，讓於庶兄宣，宏帝高其節許之。至東漢鄧彪，亦讓封爵於異母弟，明帝亦許之。一此以讓而得請者也。桓榮卒，子郁請讓爵於兄子汎，明帝不許乃受封。郭躬子賀，當襲，讓與小弟而逃去。詔下州郡追之，不得已乃出就封。一此讓而不得請者也。又有輕生報仇者，崔寔兄爲人所害，手刃仇讐亡去。魏朗兄爲人所害，朗白日操刃，殺其人於縣中。蘇謙爲金城太守，被李嵩搆陷，死獄中，讓子不葬，與親從兄弟掘地道，至高寔室，值高如廁，乃殺其妾與子，又疾馳至高父墓，掘得其父頭以祭父。一又有代人報讐者，何容有友虞緯高，父讐未報而病將死，泣訴於容，容卽爲復仇，以頭祭其父墓。郭憚有友董子張，父爲人所殺，子張病且死，對憚歎敵不能言，憚曰，子以父仇未報也，乃將賓客殺其人，以頭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一蓋其時輕生尙氣，已成習俗，敢志節之士，每爲拘難，務欲絕出流輩，以成卓絕之行。一舉世以此相尚，故國家緩急之際，尙有可恃

以播挂傾危。』(廿二史劄記卷五)

光武提倡氣節，蔚成風氣，實爲我中華民族一轉生機，宜者可以振起其頹勢發揚國力了。末期桓靈之世，豎宦弄權，遂致政以賄成，實官墨吏充斥天下，一般志節之士，大聲疾呼，以謀匡濟，乃招致閹宦的嫉惡，便羅致而爲黨錮之禍，所謂正人君子，又復大見誅戮，至其使仁蹈義舍命不渝之精神，又何見流風遺澤之深入人心了。這裏民氣既然又遭到了一次嚴重的摧毀，繼之以曹操詐術相尙，煽之揚之，誅之黜之，又陷人心於寡廉鮮恥之途，所以顧亭林說：『孟德既有冀州，崇獎折弛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平天下之術者，於是權詐迭進，姦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求利爲先，』至正始之際，而『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上習老莊之教，風俗又爲之變』。尤以曹丕既沿詐僞得國，自以爲聰明足用，附於騷人，舉朝崇尚曠達，雅好風流，遂開清談之先聲。蜀吳既亡，司馬氏不力矯曹魏之失，喪存忠義，進至八王紛爭，同氣猜割，清談大扇，國勢隕墜，五胡內侮，懷慈蒙難，舉中國二千年來夷夏之防，一旦蕩盡，所謂大河南北之慘遭異族屠戮，至其能保有江左，未爲敵虜所蹂躪者，實東漢崇尚氣節之餘風，足以辨析族類，維繫人心，不然宋明亡國之慘毒，早沾汚於我民族史實了。

(三) 宋明亡國及其給與後世的影響

中華民族有其燦爛光榮的史實，爲什麼不到三百年間竟兩度寫出異族宰割我中華民族殘酷的亡國呢？專制的流毒，在「一人強而爲人皆弱」的錯誤政策之下，壓抑民氣，摧殘才類，弄到箇種不存，萬民木立，以致所謂「夫階級世以利祿爲重，夫胡走越莫不以爲恥」而異族更以爲中國之注，夫可以稍其以和，乃不惜以名假辱之，崇之，而一般自命爲聖人之徒，舉一切經義以爲胡虜變節之具，認賊作父，貶中華民族後世無窮之創痛，追源溯始，實由我優異之民族精神及民族美德，秦駝排之，漢文摧之，魏晉更從而煽之，揚之，人格掃地，忠節淪喪，而鑄成「正氣漸滅，民氣消沈」的亡國現象。所以宋明的亡國，就是朝斷國隳，小人得志，暴政虐民，種族的結果，也就是專制流毒的結果，以觀我們今日所遭遇嚴重的敵國外患，能不爲之想而怡然與感嗎？

宋朝的亡國，由於極端專制的禍爭，而且把民族性的弱點盡暴露出來。一方面是深厚頑固守舊的倫俗性，阻滯了種種強國新政的推行，另一方面是熾熱的貪鄙自私自利之偏見，造成了兇獷狂悖及許排擠的惡風，大啓熙寧元祐之爭了。當着王安石有變法維新的時候，爲什麼會引起司馬光、蘇軾等的太極論難呢？他們唯一的理由，是說妄事興作，天下騷動，以爲「無一人習故而守常，紛紛擾擾，莫安其居。」尤

其使行新法，雖皆選擇才俊，其中亦有輕佻狂躁，凌轢州縣，騷擾百姓，於是農商廢業，謗議沸騰，怨嗟行路。山陰司馬光致王安石書，在這幾句話中大多答於人的問題，最可駭怪的，就是蘇軾反對興治水利，他上疏說：「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非徒勞，必大煩擾。」——且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山在我們看來，王安石變法維新，雖由於一般國民心理的疲頹，將棄了守舊守子們的反復詭詐，但不能不說是拯救當時的良策。

安石的新法，不能取得士大夫的同情，還由於他之矯枉過正，操切從事，不能曲盡情理，所以司馬光說：「今介甫以爲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合則喜之，不合則惡之；賓客僚友，謁見論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政之不便者，介甫輒譏然加怒，詆毀黜逐。」於是縱論新政而遭罷黜的有孫覺、呂公著、趙抃、宋敏求、蘇頌、李大臨、程顥、張戢、李常、呂公弼、蘇軾諸人，以故司馬光力爲求去了。因此在安石執政幾年當中，傾軋排擠，確然樹立了朝野間森嚴的壁壘。這裏不可單看成是安石堅持新政的推行，不惜入言所造成的結果，乃是由於他性情乖戾，剛愎自用，以阿附順己的爲忠黨，稍忤意旨的人即視爲仇讐，故一般詭譎反復之徒，得乘勢竄端詆毀搆陷，一時一刻不啻假新政以驅逐異己快私忿爲己事，所以呂嘉卿、曾布、張商英、生遂、蔡京、章惇之徒得以太快其所爲了。到元祐年間，呂公著、司馬光等用事，乃極力排擊熙寧諸臣，因此蘇軾當時力持君子與小人水火不相容之義，這裏造成一個什麼事。

果呢？不僅熙寧舊臣，含恨更深，更爲自相傾軋，乃有洛黨、蜀黨、朔黨之分，而啓今後門戶傾軋之漸。但熙寧舊臣如章惇、蔡京、張商英等不旋踵又相繼秉政，他們託紹述之名，正如蘇轍所謂以「狀書取人」爲務，大肆羅織，放逐流徙，若非哲宗固守祖宗成法，早已大見誅鋤了。固然宋朝的滅亡，由於徽欽二宗的失政，誤於和戰的不決；但由於小人得志，縉紳之禍，延及數世，民氣消磨殆盡，實爲其主因。所以觀亭林先生說：

「宋自仁宗在位四十餘年，雖所用或非其人，而風俗醇厚，好尚端方，論世之士，謂之君子道長。及神宗朝，荆公秉政，驕崇趨媚之徒，深鉅異己之輩，鄧綰李定舒亶蔡卞展王子韶諸姦，一時擢用，而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千進之流，乘機抵隙。馴至紹聖崇甯，而黨禍大起，國是日非，膏肓之疾，遂不可治。後之人但言其農田水利青苗保甲諸法，爲百姓害，而不知移人心，變士習，爲朝廷之害。其害於百姓者，可以一旦而更，而其害於朝廷者，歷數百年，滔滔之勢，一往而不可反矣。」李應申謂自王安石用事，士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賄主勢日孤，此可謂知言者也。詩曰：毋教採升木，如塗塗附。夫使慶曆之士風，一變而爲崇甯者，豈非荆公收孫之效哉！

（日知錄卷十三）

張鳳生先生更深刻把荆公移人心變士習的毒禍說明出來：

「吾于此而得世運乘除之道焉。曰：風氣之養成，其勢在遠而不在近，在微而不在顯，國家之興亡，其繫於風氣者常十之八，繫於政令者常十之二，無良好之風氣則政令必不能行。此言徵之于宋代而益信。荆公爲行新法，不得老成而與之謀，乃引輕銳少年，布滿朝列，開阿媚躁進之門。其始也，以爲能爲己用，無颯輕重，其終也則風氣養成，至不可救藥。愚不之君子與小人兩黨，遂國自猶互相翹伏，豈非荆公爲厲之階哉！」（見張著「中國之民族思想與民族氣節」一書）青年書店出版）我們要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那麼金人寇汴，二帝蒙塵，高宗嗣位，應刻刻振厲以雪恥復地爲終身大業了。當時爲國家民族効死力的，如李綱、虞允文之爲相，無時無刻不以收復失地洗雪國恥爲己任，無如信任不堅，聽任黃潛善、汪伯彥、史浩、湯思退之邪謀而沮其計，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爲將，戰必勝，攻必取，使得專其任，行其策，以井力北指，則不難國逐胡虜，還我河山。乃此則於樞臣，不竟其功，反見誣殺，可知高宗孝宗名爲中興之主，而親締奸邪，冤抑忠良，狐疑兩端，和戰不決，無怪其自取滅亡了。這裏我們要特別指出秦檜誤國禍國的罪惡，上浮於天，下達於地，他不僅爲金人奸細，賣國求榮，誅殺良將，因爲這種顯明的罪惡，是人所盡知的，但其摧殘善類，不遺餘力，一面引用奸諛之徒，以爲己助，同時頗指氣使，遂令一般宵小甘與善人爲仇，所謂言官亦爲其攻擊，挾以爲攻擊善類之具，對於異己一言一字，稍涉忌諱，即興文字之獄，一時忠臣良將，誅鋤殆盡，其

頭無恥者，遂爲槍用，爭以誣陷善類爲功。另一方面粉飾消兵，以爲天下已治已安，而途非有至德在之。同時禁作私史，許人告許，自槍再相。堯前罷相以來詔書章疏稍及槍者，率更易焚棄，毀滅史書，變亂是非，以泯後世忠邪之辨。這樣壞槍用心之險毒，不僅使北宋廉恥之節，斷喪無餘，而使南宋忠貞之基，終於爲失墜了。因此宋室之亡，亡於偷安自私的陋習，亡於猜忌深險刻毒的類風。

代漢明魏的亡國，更有自取滅亡的地方，不僅繼續宋室衰頹敗壞的歷史發展而已。然而如出一轍的，便是門無餘軌，自相殘賊，致貽今後民族國家無窮之創痛。這裏我們應該痛悼於宋元璋之喪事，雖以歸卒葬而過甚，功臣各不自保，天下彌宗豪族，幾至殺戮殆盡。到了燕王竊據政柄之後，更爲兇殘，乃大開殺戮之門，至於夷族坐黨死者，不可勝數。史載胡藍二獄，誅至數萬，故練子雷疏云：「陛下以區區小過，縱無窮之誅，何以爲治。」葉伯臣疏云：「取士之始，網羅無遺，而有踐跌，有免誅戮，則必在屯田築城之科，不少顧恤。」這可見待士之薄了。所以有明之士，不樂仕進，朝臣每懷疑懼，朝不保夕，那裏入君之殘忍刻薄，又何從以激發人臣忠君愛國之思以爲國家民族効死力呢？他們僅僅憤憤於皇恩民弱民的一貫策，因此自成祖以來，崇信佛道以柔弱民氣，故乎諫上言有一四方多流徙之民，三邊缺斃守之士，廢僧太多，恐乖本末。」的話。他們以爲民氣柔弱了，便可以保持長治久安的局面，不知外患驟至，有誰替你捍衛國土呢？

與將不和，便相攻掠，屍橫遍野，人民愁苦，僅有古史可法，何能以救天下之傾危呢？

我們綜觀明季亡國的得失，第一殺戮過慘，恩信不孚。歷代以來，均以積惡用事，引不得不救，害重難救，造成聚斂貪污賄賂公行的腐惡政治，形成民生疾苦，土匪蠶起的必然結果。所以有明之亡，亡於流寇，亡於庫藏空虛，亡於一般人民救死不贖呢？第二由於誅劊剪滅的結果，致人才凋敝，雖有治亂邊備的良將如于謙，熊廷弼，孫承宗，袁崇煥之流，不能完成其守禦之策，而被陷詔阻撓以死。第三歷朝以來，來必勳興大獄，戕害善類，以致羣小在位，寡廉鮮恥，志節淪喪，以洪承疇之舉行修養而屈膝虜庭，其他實可概見了。所以有明之亡，亡於人才凋敝，亡於志節之淪喪。同時宋明亡國所給予後世的影響至為鉅大。其一異族之入據中國，以為吾民之生存與安全，并未受到損害，而長期奴役的結果，不免有夷夏亦中國之錯誤觀念，而形成民族意識之模糊了。其二由於中國士大夫階級之安富尊榮的卑污心理，給予異族以極其屈辱懷柔政策，盡可能的收攬人心，始則下詔求賢，繼則開科取士，乃使吾民不復記憶祖宗之深仇大恥，反而恬不為怪而津津稱頌於一聖朝深仁厚澤之不已。民族的氣節，因此蕩然無存了。三我們從歷史檢討，認為一政治節操亡的敗壞，是一切國亡種滅的苗素。因為在這一切歷史發展的過程中，無論為宋朝的亡國或明朝的亡國，都是循着一個必由的途程而來的，這必於外人得志，廉恥喪盡，政治混亂，民生疾苦，益之以誅劊剪滅，人才凋敝，士氣不振，國亡族滅便隨之而至了。這裏我們應

該進一步去理解爲什麼會造成這種險惡的局勢呢？我們認爲「氣節不立廉恥不存」一個最大裁成的力量，便是歷代專制帝王的橫肆壓榨屠戮，使稍有氣節之士，不獲見容於世，而且不能以自生存；因爲數千年來孔孟學說的薰陶，所謂經明行修之士的這種堅強的正義感，遇事劃出一個當身與不當爲的界限出來，即王陽明先生之所謂「致良知」，那麼認爲一切不合於義理的作爲，便挺身出而譴之諫之，或以死赴之，不稍顧徇，這樣便對於一般予智自雄的專制帝王的行爲上，無形生出一種打格不相容的態勢出來，而詭譎善媚反復多詐之徒得以取悅於人主了。

一般詭譎之徒，其出處純爲利祿，爲一己之尊榮與權勢，所謂國計民生，置之度外，因此不擇任何手段，以達成其私圖，如王恣任論馬士英的疏中說：「士英公竊太阿，肆無忌憚，親上之繳，而有以中人之上嗜飲，則進醴醪，上悅色，則獻淫妖，上喜音，則貢優錦，上好玩，則奉古畫，巧卸疆場之專於史可法，而又心急其成功。招集無賴，養官鬻爵，門下狐狗，服飾橫行，朝廷篤信之，以至於斯也。」更而畏懼正義之指摘，不得不有以甜天下之口，乃動輿天獄，誅劓善類，弄到天下草足而立，敢死不暇，所以權奸的一貫行徑，以詭譎，逢迎，揣摩博取人主之寵幸，同時爲鞏固其地位，擴張其權勢，不得不引奸諛之徒以爲己助，所謂天下頹然無恥之辭，供其奔走，乃至煽揚，構陷，編織，日以報怨殺人爲能事，那還有什麼廉恥與氣節的存在呢？惟有束手以待國亡種滅而後已，正所謂「戰鬥之氣，發於忠

救國忠憤之心，發於慷慨，事至今日，人人無恥，在在不憤矣。

不國家民族也，居在亡絕續的關頭，平時從未會與開朝政的人們，懷於國難嚴重，這能激發其忠憤的情人，轉而從事於「勤王」的對賊鬥的努力，但是種奸的行徑，認爲這種勤王對賊鬥的發展，是妨害其種族的，一個最大的障礙，必須我去之而後可。上面是心思人之成功，無形着損其種族與地位，另一方面就是所謂「漢奸」的對抗戰的破壞，在他們之所謂「屈辱和平」，早已成竹在胸，因此不斷爲民氣之摧抑。金入寇汴，山東義師起，執政謂以論師爲名，請下令止勤王。蔡澤乃上疏說：「自敵國京城，忠義之士，憤激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略，不能無而抑之，使之飢饉困窮，弱者填溝壑，強者爲盜賊，此非勤王之罪，乃當時措置乖謬所致耳。今河東西來，皆敵國而保山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諒其面而爭先效死，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誠恐草澤之士，一聞此言，倉卒有急，誰復有顧忠效義之心哉。」自明竊王初立的時候，第一道旨關於民衆的旨，是不許置諸勤王，因其內在權利之爭，重於國族之爭，故馬士英之以爲北兵以「清」至，猶可讓款，若左逆（左良玉）得志，若輩所言，我君臣獨死耳，世那麼不惜壓抑民氣，排除異己，也就是壓制了後來所謂外邦，不于家奴心的變誤心理。

現在再對上兩結論，我中華民族在歷代專制帝王壓榨，屠戮以及種奸排擠，誅鋤與骨小奔逐，播揚

● 搆陷、羅織的惡作劇之下，養成一種深險刻毒猜忌的民族劣根性了。因為民族性遺傳的力量是特別鉅大的。假使不是這種遺傳力量之鉅大，爲什麼朱元璋之殺戮功臣要比劉邦慘酷到幾多倍，魏忠賢之戕害善類，羅織搆陷，又要勝過於章惇蔡京之徒呢？有了秦檜史彌遠之固權保位，殘害善類，以促南宋之覆滅，爲什麼還有馬士英、阮大鹹繼起其後，而加速明朝亡國的進程呢？他們何曾不知道天下後世公論之可操。這裏如果說歷史是垂訓後世的，因爲他的功用，是教人不要這樣作，但在事實上是教人要這樣作了。可以說，中國歷史上亂的日子多而治的日子不常見，這的確在深險刻毒猜忌的民族特性之下，不容易使優美的士風能適當成長起來，也就是使「政治節操」隨時受到嚴重的摧毀，而亂臣賊子接踵於天下，怎能逃避國亡種滅的慘禍呢？在今日我們的回顧與前瞻，實在要使我們感到無窮的刺痛和惕勵！

四 當前的問題

一 (一) 問題的形成

中華民族五千年來所未曾受過的恥辱，全世界人類所未曾備嘗的慘痛，現在我們都受到嘗到了。環顧四週，我們是等待最後運命的決定呢！這是一個可怕的結局。還是須要我們竭盡最大的努力去爭取「最後勝利」，從黑暗中去追求光明？本來「多難興邦」，「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現在我們已臨到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了。如果說「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不慎」，這是斷難希望每個人具有這種警覺性的，但禍端已發，外邦異族尙且對之歎歎嗟嗟之不已，那容我們瞻顧徘徊，不去痛自悔罪呢？抗戰四年來，雖然已充分表現出英勇奮鬥的偉烈奇績，然而一切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尙沒有充分隨着抗戰的需要而向前邁進，這是無容爲諱的事實。但是，這緣結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呢？

我們要瞭解現在，就要明白過去。因爲後時代的變化，都是在前代已經成了問題，後時代的人物事蹟，就是前時代的產兒。換言之，今日一切成爲問題的，就有他在歷史上所成就的遠因和近因，這便是由於清季二百六十餘年來長期奴役的結果。張厲生先生之言曰：「勝清知徒殺不足以緩服也，於是運用

懷柔政策，一面尊崇明太祖，封其後朱之璉爲一尊侯，以減少漢族之反感，一面開博學宏詞科，纂修圖書集成，四庫全書，以網羅人才。一面表章程朱，假借理學，以喚起漢人尊君抑臣之心。一般志在利祿者，已爲所牢籠，甘爲臣僕而不辭，而心存故國，見於詞翰者，又與文字之獄，一網打盡。總計莊廷鑑、戴名世、汪景祺、查嗣庭、陸生構、曾靜、呂留良、胡中藻、徐述夔、王錫侯諸獄，所殺戮者甚多。被焚禁書，自乾隆三十九年起至五十二年止，銷毀共二十四次，五百三千八百種，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而乾隆以前所銷毀者，尙不在內。明季真實史料及詩文集之有關民族思想者，蕩然無存，斯世文字史上之浩劫，而千古未有之奇痛也。自茲而後，中國民族完全爲滿奴所馴服，無敢與抗者。蓋康代異族制取中國之法，以滿清爲最毒辣。不但未有如滿清之滅中國，既以八旗子弟分駐各省，壓制漢人；又令薙髮胡服，毀我衣冠，以華制華，到處皆漢奸之流毒，剛柔並用，使民族思想消滅於無形。不但被盡能奴之囚之也，蓋已入其樊中，受其蒙養，甘於爲奴爲囚者之多也。一因此影響所及的：

在學術上形成腐儒頑固保守的心理，而有一般儒道守舊的士子們，拾取聖人糟粕，不明種族大義，故湘軍之夷漢氏，其檄書不稱討叛，獨以異教愆禮數之。當康有爲倡維新變法之論，乃著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說，便觸犯大部份經生文人的衆怒，以爲襲襲聖典了。如朱六新和康論辯的信中說：「孔子自偽古文之說行，其表申於人心，人心有一六經不可違信之意，好奇而寡識者，遂欲黜孔學而立今文。」

夫人心何厭之有？六經更二千年，忽以古文為不足信，更歷千百年文能必今文之可信耶？「竊恐証許古人不已，進而疑經，疑經不已，進而疑聖，至於疑理，則其效可睹矣。」翁同龢雖是一個主張變法的人，但看到屢之疑經疑聖，就說康是「說經家的野狐禪」，並且說：「此人居心叵測」。這一般「衛道自任」和「假道求食」的所謂奴儒騷儒們，固於一隅，不思進取，不知廉恥，不明大義，只圖個人的安富尊榮為已足。

這樣在志行上，一般人只表現無骨節，無是非，惟「依違取寵」以投合時機罷了。這種「依違取寵」的人，便是能很巧妙的迎合主子的心理，而博得自己的榮寵。當着義和團仇殺教民的時候，西太后命剛毅和刑部尚書趙舒翹察看「義民」的情形。舒翹見這些義民，都是市井無賴，知道他們不足用，但是不敢違背太后的意向，就報告太后，說他們真是很可靠的義民。又如榮祿在當時擁有重兵，是西太后最親信的人物，明知道拳匪不可利用，外憂不可妄開，祇因存着「依違取寵」的念頭，不得不順應西太后的意旨。直到禍延肘腋，還是用依違的手段；因此他電告江督劉坤一說：「上以一弱國而抵各數強國，危亡立見。兩國相戰，不罪使臣，自古皆然。祖宗創業艱難，一旦為邪匪所惑，輕於一擲，可乎？」

「上」却一面命董福祥向使館開砲，這種依違取寵的作風，便是在柔靡無骨的士風中習染以成的。

雖然柔靡的士風，一時無從振厲，但在我一總理領導之下，又以我先烈堅貞刻苦犧牲的精神，造成

予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的光榮史實。然而民國肇造之初，一般革命黨員習染於貪鄙自私的敗壞風氣，遂健忘於建國的重任了。總理會說：「民國建元之初，予極力主張施行革命方略，以達革命建設之目的，——而吾黨之士，多期期以爲不可。經予曉諭再三，辯論再四，卒無成效，莫不以予之理想太高。——嗚呼，是豈予之理想太高哉，毋乃當時黨人知識大低耶？予於是不禁爲之心灰意冷矣！——此予之所以萌退志，而於南京政府成立之後，仍繼續停戰，重開和議也。——」這時以權詐相尙的袁世凱看中一般人心的弱點，乃從而煽揚之，利導之，以爲黃金耀於人前，白刃脅於人後，「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了。因此竭盡其機智，不惜以險惡詐僞的手段，巧爲轉移社會的趨向，誘使天下之士，見黃金則膜拜，見白刃則戰慄，馴至養成一般阿附逢迎柔順避忌不白不黑的脆弱心理。也同時養成一種權利忘義寡廉鮮恥的奔競敗風。這裏便演成繼續不斷難解難分的政爭，造成許多內在的矛盾現象，製造無數殘民以逞的內戰出來。這便是說是導源於一種不良的心理作用的。我們以歷史的功罪而論，袁氏毀法亂紀背叛民國之罪小，而其移人心變士習之罪實大，因其毒禍人心之深，不能一旦洗刷，且滔滔之勢，行見其日益披猖呢！梁啓超先生曾有過一段最確實最痛心的話：

「護國軍總司令蔡將軍之言曰：『吾儕今日不得已而有此義舉，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幾爲我國人爭回一人格而已。』嗚呼！我全國父老兄弟，——亦知將軍此言，其中含有幾斗之血，幾斛之淚

者。嗚呼！我四萬萬人之人格，至今已披其世凱蹂躪而無復餘。袁氏自身，原不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何在，以爲一切人類通性，惟見白刃則戰慄，見黃金則膜拜，吾挾此二物以臨天下，夫何求而不得者。四年以來，北京政府，曷嘗有所謂政治，惟有此二物之魂影縱橫披猖，盤旋薰灼於人人心目中而已。夫無論何國皆中人之資居大多數。中人云者，導之善，則可以向善，導之惡，則可以向惡。袁氏據一國之最高權，日日以黃金誘於人前，而日日以白刃脅於人後，務使硬制軟化一國之人以爲之奴隸。自非真強立之士，其不易自拔也有固然矣。——蓋四年以來，我國士大夫之道德，實已一落千丈，其良心之麻木者十人而七八，此無庸爲諱者也。而此種罪業誰造之？吾敢斷言之曰：袁氏一人造之。袁氏鑿破人類公共之弱點，乃專務發達此弱點以資其利用。其有能自制其弱點而不甘受彼利用者，則必設法屠殺之，驅逐之，害盛之，使其不能自存。當前清之末，袁氏執政，已專用此策以自植勢力；我國政界惡濁之空氣，實自茲播種。及其爲總統，乃益煽而揚之。試思以此種人爲淘汰之術，挾大力以鼓鑄社會，云何可當。使袁氏帝國成立，康續行此政策，數年乃至數十年，其必善類日漸滅絕，惟惡種獨能流傳，其不至使我全國人盡喪失其爲人類之價值焉而不止也。

從上面一段話看來，可知袁氏毒禍人心之深且鉅了。在這裏我們就當時的精狀可以指出下面幾種

誤心理出來。

第一、只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形成一種「予智自雄」的狂妄心理；因此毀法亂紀，國家失去重心，故自袁世凱帝制自爲之後，繼之以曹吳孫張，無一不欲步伍袁氏，以成就其「囊括四海」的雄圖，不過所取的方式與手段略有差異罷了。而且中間還演出張勳復辟的一幕怪劇來。他們一貫心目中，不知有法紀的存在，一切行爲的依據，都是確立在「損人利己」的基礎上；所以萬乘信義，不擇手段，造成政治上種種不道德的行爲。他們只要求一批柔順易制的忠馴臣僕，許多貪殘的人們，在他羽翼沒有豐滿的時候，還能曲盡其忠款，一朝足以左右輕重，便存着「起而代之」的心理，故不斷有倒戈內訌的事件發生；所以他們本身也於不知不覺中墜送於此狂妄心理作用的下面了，因其內在的矛盾，旋復生長起來。

第二、是一種巧爲遮掩假名行惡的虛妄心理：袁世凱專尚詐僞，故其一生最大的罪惡，在於轉移社會一般趨向，使道德消沉，廉恥淪喪，因此人皆師其故智習爲詐僞了。當他攫取全國治權的時候，即蓄着帝制自爲的野心，一面以分化軟制的手段，對付革命的勢力；另一面乃假手於籌安會，偽造民意，以促成洪憲帝制的實現。雖然袁氏的狡詐，特別高出人一等，然而繼袁氏以後，無一而不在巧託名義，以文其奸而行其惡，所以曹錕以賄選而登台了，段執政也相御用善後會議以行其巧爲控制的方法了。

第三、是養成一般貪緣奔競報復圖逞的虛榮心理：數千年來一般士子們富貴利達的虛榮心理是一貫的，然而表現得今日異常獨特。這由於紀綱不振，失去用人的準繩，登庸之道乖張了。因此引起一般人的羨艷和妬忌；羨艷的是什麼？因為看中了幾多好的榜樣，某某以何道而仕進了，又某某因何術而致榮顯了，乃羣起效而尤之，造成了貪緣奔競之風。妬忌的是什麼？因為這一切用人的不平，引起人們的懷恨與失意，便有不惜以種種手段去發洩其忿怨的。所以貪緣奔競與報復圖逞的心理，實在是分不開來一件事體中的兩面。

第四、是務於標新立異各自爲是的驕縱心理：因此各立門戶，黨同伐異，許多主張上的歧異，并不是由於對某項問題認識不同，見解各別，乃實由於事實上各有其懷之鬼胎。故此面子上是互爭政見，而骨子裏是各存私意與偏見。同時爲了滿足自己的支配慾，鞏固自己的利祿，不惜巧飾說詞，拿人家當犧牲品，甚至把一批批純潔的青年斷送到無路可走了。可以說：過去一切問題的癥結，都導源於這幾種惡劣心理的。

(二) 中國社會現狀的剖析

我們知道今日一切成爲問題的，在前時代已經成爲問題了。這裏很明顯可以看得出來，中華民族

經過清房長期的奴役與袁氏遺禍流毒之深，好像一種毒素散佈在社會組織羣裏面，乃至任何方面無不爲這種惡勢力所感染，故此積重難返，雖欲「改弦易轍」，斷非一朝一夕所能奏功，但是因循以往，泄泄沓沓，惟有一任歷史上腐惡的陳迹繼續發展而已。因爲人類具有一個共同的性格，就是「惡勞而喜佚」，尤其中國的士子們，充分具備安富尊榮的偷惰自私自利心理，有誰自甘寂寞？不然許多有志之士，爲什麼一旦改易其初衷而變爲更兇殘更暴虐的貪鄙無恥之徒呢？這便是社會上具有一種不正當的誘惑力量。由於事實的教訓，個人主義的極度發展，形成普遍的爭逐與攘奪，反映於政治現象的，是混亂、險詐、支離破碎，如此可以看到環境支配人的偉力了。我們環顧四週存在着一些什麼險惡現象呢？

從國民心理狀態說：

一個國家民族的強弱盛衰，尤其當着嚴重的敵國外患的時候，更需要旺盛的民氣——一般國民的心理現象，而不專在強力之如何擴張了。因此我們看到國民精神之不獲根本改造，許多政治上社會上之改革，都不能獲得適當的進展。譬如澄清吏治，在國家沒有獲得統一之前，還能歸罪於地方的割據，但在民國十七年北伐大功告成全國統一至民國十八年開始訓政之後，應該有長足的進步了。雖然也曾看到幾次大的掃蕩來肅清貪污的惡風，實際收到了些什麼刺激的效果？所以我們看到許多良法美意，都被一頁頁刪削過去，這一面是立法問題，另一面是人事問題，然而最根本的問題，便是國民心理的疲頑。現在

我們關於各方面的檢討，認為這種疲頹的國民心理狀態，是由於民族的生活形態所反映出來的。

中國社會是一個農業社會，沒有構成爲近代國家的經濟基礎，雖然正邁步向「抗戰建國」的途程上前進，這必須在抗戰勝利以後，才能完成爲近代國家的建設。因此無論從那一方面看，除了幾個工商業薈萃較大的都市而外，還固守這一貫原始的生活方式，所謂「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在他們整日汗流浹背無怨無尤的，惟在力求一家的溫飽而已。他們一生忙於討老婆、娶媳婦、生兒子、添孫子，積聚更多的財物，以達到他們子子孫孫坐食消閒的目的爲已足，送子弟讀書的唯一目的，是在升官發財，以爲這是光宗耀祖揚名顯親了。同時也不妄分冀求，終身胼手胝足而不得着一家溫飽的，乃一意歸之於命運與風水而已。因此一貫傳統的樂於家庭生活，愛好自然，愛好和平，以終身不見兵戈爲榮幸，安分守己，所謂「各人自掃門前雪，那管他人瓦上霜」，所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充分的表示了數千年來幽閒不管事的民族思想，沒有深厚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

在中國社會關係之下，只有濃厚的家庭觀念和狹隘的地方主義。在倫常中敦鄰睦族、孝子賢孫，便完成了做人的義務。縱令家族關係之擴大，也不過造成爲同鄉主義，小集團主義，朋黨主義，未嘗超越於鄉土的範疇以外，以民族國家之利益爲利益的；乃至貪污與漢奸之徒，置國家民族生死存亡於不顧。孔子的怨道，老子的清靜無爲，正符合於此種恬淡、保守、忍耐、儉樸、慈愛的民族性。我們讀了陶淵

明先生的歸去來辭和桃花源記這一類文章，就知道所謂賢士大夫，不過是「獨善其身」以優游歲月吧了。這樣人情太熟、禍福太明，形成一種「冷眼觀世」的幽默態度，往往非笑人的往返徒勞，缺乏冒險進取的心思，有時會變成更圓滑、乘機偷巧的小人，所以胡林翼說：「陰陽怕懵懂」，是最痛惡於此泄泄沓沓的世俗的。然而泄泄沓沓之中，便產生一切的罪惡：在倫常的關係上，養成一般人的倚賴心理，同時要把這一切關係維持得嚴密而完好，非具有極大的耐性不可，所以含容包荒，囿於一隅，而不能且無法擺脫這一切糾絆，便形成普遍的疲頑心理狀態。

在這種泄泄沓沓的疲頑心理狀態之下，貪污與漢奸便不斷的生長了，因為他們潛在着一貫的心理作用，便是如何去發展個人的私慾，如何去解決這一切不可擺脫的羈絆——去嚴密而完好維持這錯雜的倫常關係。他們不惜名譽，只顧目前，不計將來，也就是只要眼前富貴——做大官、發大財，國家民族的存亡絕續，便絲毫不關痛癢了。貪污之徒，不是不知國家的懲罰，他們心目中總覺得忠良不見得膺重賞，奸邪也不會受嚴罰，而且「貪官易作廉吏難充」，生前之名與死後之事，并不能促起其勉而為善，所謂「笑罵由人笑罵，好官我自為之」，惟恐一旦失職，兩袖清風，不得不痛感於身後之蕭條，又將何以終餘年，不得不聚精會神於聚斂搜括之一途了。他們以為滔滔之天下，善善惡惡，何足稱異，即令賣國者之所為，有官有勢，又可以為後代子孫衣食之謀，尤其是先代許多所謂「降志辱身」之徒，炫耀一世

，更動其爲漢奸之念了。

從社會現象說：

國民精神的根本改造，這是培養國本的一個根本要圖，因爲許多國家確立適當的教育政策，以養成其一貫立國的精神了。現在我們國民心理的疲頹，精神的頹廢，是否要歸咎於過去教育方針的不正確與教育者本身之缺欠呢？當然也有其因果關係的，不過這是原因之一，其中還有一個最根本的原因，因此總裁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與精神動員，就是這樣一付導汗劑，如此風靡全國，又何患國家社會之不進步呢？但是空言「正人心挽頹風」的話，是無補時艱的；那麼就是說用一種什麼力量去改造惡劣的社會環境，因爲獎人爲善與導人爲惡有一個根本異途的地方。如果不把社會這一切不良的習尚改正過來，怎能造成一種適當強固的誘勸力量以範圍人心呢？人之爲惡，強半由社會現象迫之使然的。

誠然，人的行爲的善惡，完全繫於一轉念之間，可與爲惡也可以爲善的。但在惡劣的社會環境中，有一種導人爲惡的地方：其一是社會具有一種鉅大不正當的誘惑力量。譬如南洋羣島中遺留的蠻民，在他們腰上掛了許多被殺的人頭，以此爲榮譽。娶妻的時候，如果腰上沒有掛人頭的人，卽被認爲是怯弱無恥的賤丈夫，因爲蠻族中的女人，見了沒有掛人頭的男子，是恥其與相配偶的。現在我們看社會上所崇尚的是什麼？假使崇尚詐僞，入皆習爲詐僞，崇尚勢力金錢，入皆習爲爭逐攘奪以攫權取利了。雖然

中國不是奴性天成的族類，有誰不奉強取豪奪予取予求的強人爲主子。其二是一種相應而生的阻抑力量。大凡人類社會中，一方面固有對於現狀不滿而亟謀改革之分子，然同時亦有對於現狀極感滿足而絕對不欲變更之分子，因此爲圖保持現存社會原有狀態之努力，較圖謀改革社會之努力，還要增高多少倍。所以保持現狀與圖謀革新的兩方，根本無法調和起來。故此臭味的投合，重於道義的結合，也就是使善類根本不能立足於惡羣呢！

從前者而言：表現在社會的動態上，一般既無是非之公，那便是意識模糊，所謂笑罵亦無人笑罵了；同時基於這種模糊意識的形態上，也就只有強烈的現實富貴，才能獲得社會上的尊崇和稱譽，根本就沒有人見到什麼是廉恥，什麼是氣節。凡此種種，人的爲惡，多半由於環境的習染，有時環境支配人的偉力，能迫使你爲惡。

周圍的社會獨自以生存。許多明眼人，爲了個人的生存，不得不。……，也祇有空自嗟嘆，因爲大勢所趨，相率以爲「有了今朝不顧明天」了。這樣一般只重勢利金錢，今日有官有勢，明日國亡家破，拘非所計；那麼變節賣身——以出賣國家民族的利益去換取個人升官發財，要算得計的，如此由貪污而走向漢奸的路上來。當然這一般人物不甘寂寞，有可以聚斂貪污的機會，還不至喪心病狂，來幹着出賣國家民族的勾當。假使一旦失勢而投之閒散了，不得不尋求機會，以解決其物質上精神上的苦悶，重新去開闢一個聚斂

貪污的道路，也就只有充當漢奸爲最捷徑了。許多漢奸們躊躇滿志，無不驕奢淫佚，放縱邪侈的。他們生活上有無厭的要求，不得不求意外的金錢，以供其無窮的揮霍。所以貪污漢奸是這種惡劣社會現象之下的必然產物。

由後者而言，表現在社會上的動盪不安，就是瀰漫一團傾軋排擠攻訐排他的惡風，便形成普遍的爭逐與攘奪了。因之，社會的觀感，也就形成一種對比的力量，而使國家民族蒙受無窮的損害。這裏我們

民衆，壓抑民衆，以至迫使人民不安生業，於現狀不滿、懷恨不平與失意份子，逐漸在社會上坪以起來。那麼許多無氣節的士大夫，偏重個人意氣，昧於國家大義，以圖洩忿報怨，而於有意無意中流爲漢奸了。所以貪政養奸，暴政養奸，以至姑息養奸，便是這個道理。同時政治上的對立，種下許多積仇宿怨的因子，推翻了北洋軍閥統治，但在北洋系統之下依然存在不少的殘餘人物，便無形給予日寇以製造漢奸的材料了。所以許多奸人也無形變成了漢奸。據聞王克敏湯爾和之流，在和敵人共同慶祝攻陷南京之際，潸然流涕。雖然他們也會受到良心上的譴責，但已身敗名辱罪成莫贖了。

我們看到社會現象，由於個人主義的高度發展，形成普遍的爭逐與攘奪。同時散見於社會蠱官取利

的人愈多，而國家設官分職的員額愈有限度，非存於事，乃不得不出於相傾軋相排擠，更不得不植黨營私，終必以陰險狡詐的手段而成其謀了。所以社會上陰險無恥之徒常佔優勢，而且是博得社會上的禮譽和尊崇的，反而廉潔自愛之士，居於劣敗的地位，不值不見重於社會，而且不能以自生存。如此可以看見到社會上的條件，無往而非樊人為惡呢？可以說：殘留在社會的一切惡劣現象，實在種下許多國亡種滅的毒素。

從政治環境說：

一個國家有如斯疲頹不振的國民心理，才能形成如斯險惡的社會現象，這樣植黨之薄，怎能產生良好的政治環境。我們看來一般傾向，無非津津於奪取政權而已。究竟他的癥結是在什麼地方呢？

我們知道一種敗壞風氣的養成，是有其久遠的根源的。高一涵先生曾評論立憲黨說：「這黨宗旨在和平改革，無論什麼時候，祇要容許他們活動，他們都可以俯首遷就，到了他們不能活動的時候，也可以偶然加入革命黨，但是時局一定，他們便仍然依附勢力，託庇勢力之下以從事活動。」在當時很確實可以看得出來，立憲派人物，自始至終，就想依附一種勢力來抑制民黨的新勢力，無論是由傾袁或附段，都是拘於平時的黨見，而不會關注於國家民族的利害禍福上來，僅有一個時期，反帝運動的展開，是得到立憲革命兩黨以上的通力合作，因此倒袁能獲得迅期的成功。但此時立憲派的領袖葉啟超認為是

「神奸既伏，人慾橫流，而進於洪水漲洞演惡虎村」的時期到來了，所以蔡鐸一死，不能在川瀛野為該黨造成一個改造政治的小地盤，不能不力謀與段祺瑞合作了。因此在當時一般所謂政黨的不健全的心理：

一、一般黨員無定見，朝是暮非，往往一個黨員，今日列名甲黨，明日列名乙黨，同時，並得列名於兩黨，造成一種跨黨的行爲。因此以入黨為競權俸利的工具，好比狡兔三窟。此種行爲最為可恥，但在民國初期，視為平常，尤以洪憲帝制以後為特甚。由於時勢之推演，後此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跨黨份子，更有一種非常狂大的陰謀與無恥。

二、由於一般黨員的無定見，而黨義不過是一個空洞的招牌，主張雖無歧異，而在行動上，各趨極端，因此往往對於一個不同於黨的人物，無論其主張是否適合當前的需要，無論其行動，是否含有三個大政治家光明磊落的態度，都易遭致反對黨神經過敏的揣測，且處處以疑忌的眼光視之，究之一檢視其黨義和黨綱，便看不出什麼歧異的地方了。

三、由於視黨義為空洞的招牌，遇事依違遷就，只以本身的利害為轉移。我們看在袁氏執政期中，舉壇約法，誅劬異己，可算罪大惡極了，但至南方揭鑿職權以張國法的時候，進步黨的報紙，大都編造袁氏非難國民黨，進步黨（不限於進步黨）的議員，尙有在國會提出「征討案」向袁討好的

這種依附權勢的行動那裏能看得出什麼正義與是非。

我們回溯歷年來不斷的政爭，並非由於主張上有什麼歧異，然在行動上仍不免有多少歧異的地方。這是什麼原因呢？其一由於對人的問題而起的，認為某某與我好惡不同，用舍各別，雖然主張是接近而且趨於一致了，頃間搗手置歡，不免過意不下去，只好從許多枝枝節節方面作無意味的爭執，以圖遮飾其齟齬，同時抱着無限忿怨，便無形隱藏一種「你不幹讓我來幹，你幹得不好了我再來幹」的刺繆心理。尤其是過去，甚至以反對個人的精神，來決定政府政策的執行，或決定政府機關的組織。其二由於對事的問題而起的，則便是各在其錯雜的行動上造成一種不可名言的苦衷，因為許多為了一時的利害作用，盡可能去找尋發洩忿怨的機會，盡可能去煽揚，不擇手段，弄到一洩千里，至於補救無及了。有時為了各自疑慮，不能放胆做去，也祇好聽任一種險惡局勢繼續發展下去。總之一般固執成見，不能洗心革面，無非重在意氣爭無聊的面子而已。

(三) 擺在前面的兩大問題

我們國家民族正當着危急存亡的緊要關頭，還存在着一些什麼內在的問題呢？固然我民族英勇抗戰的犧牲奮鬥精神，從抗戰初期到現在，不會有絲毫減退；但是，還得領要我們透視整個陣營，認真來看的犧牲奮鬥精神，從抗戰初期到現在，不會有絲毫減退；但是，還得領要我們透視整個陣營，認真來看

定我們自身的缺欠和醜惡，去作正確的估計，忠實的檢討，便可以發覺出一種什麼錯誤心理在作祟了。我們把頭腦冷靜一點來看，單就周佛海已往的立論，是最痛惡於貧鄙無恥的秦檜賈似道（見周著復興民族的幾個根本問題）之所作所爲，今日竟然來充當第一流漢奸，所謂「是非混淆」，到今日才算真正的混淆了，爲什麼以一個判定歷史功罪的人而見不到自己的醜惡和是非呢？這不僅周佛海一人如此，因爲政治界一種不良風氣的傳染，是極普遍而富有持續性的。我們只要去看許多曾參與「五四運動」的人物，不到幾年躍上了政治舞臺，述其所爲，以視其曠昔所深惡痛絕的一種貧鄙無恥的行爲，還要變本加厲！

當前的中國，無論在朝在野的任何黨派，應該警覺於國家民族危急存亡在於呼吸之間，一致捐棄成見，不分畛域，以救亡圖存爭取全民族解放爲共同目的。那麼救亡圖存的根本方案，便是集中和發揮全民族的抵抗力量，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者出中國，以完成救國家的任務。這就是說：抗戰開展以來，使我們最感到興趣的，就是統一的國家，統一的政府和軍隊，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已逐漸形成其強固的基礎。這在中國近代史上是未曾有過進步的一頁。不過在各方面還存在不少缺欠，誠如馮副委員長所說：「我們已經精誠團結，但還未能心口如一，已經一心一德，但還未能責己而不責人。先賢說：『兄弟鬩牆，外禦其侮』，我們都應該互相體諒，大度包容，誰好誰不好，多麼不好也比日本鬼子強得多，要提防敵寇分化我們的政治陰謀，要聽見汪逆兆銘所高唱的口號而知所警惕。要更加精誠團結，一心一德

，把全國力量集中來聽從最高統帥的命令，一致地打擊敵僞，把日本強盜完全驅出國境。」（詳見「慶幸中應有警惕」一文）從這段話看來，我們知道當前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了。

我們根據上文的檢討，就知道擺在我們前面的問題：一則為國民精神的根本改造，一則為建立民族的中心領導問題。這兩個問題，是合而為一的。

自前者而言，我們覺得年來推行新生活運動的結果，還沒有把不健全的國民身心狀態改正過來，許多政治上軍事上的領袖人物，刻刻在誥誡他的部屬，社會上許多負責份子，無一時不在奔走呼號，尤其我們的「總裁厲行領導「國民精神總動員」，在每一次的講演詞上或其他的文告上，無一不在勸勉國人，又曾見到了什麼顯著的收效；因為一般表現得醉生夢死，無從振奮起來：一面有了職責而沒有盡到責任的人，還還算為才能低劣，是效率的問題，而且有不少憑藉地位，假名行惡的人，倒行逆施，行無所事，無往而非幹其自私自利違法亂紀的行徑；另一面有了能力而沒有把它的能力運用到正確的途徑上來，終日幹着釣心鬥角揣摩逢迎的勾當。許多懷恨失意的人，更固持着一貫忿怨險詐的心理，有誰心目中存在着「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純正思想呢？

同時許多漢奸傀儡們的內心上，還生出一種「悲天憫人」的感慨，以為「斯人不出如蒼生何」，根本不會認清滿漢奸是戕害國家民族生命的冒險事業。因為在日軍佔領以後，社會秩序紊亂已極，日本帝

國主國者需要秩序的統治，一般無知愚民也需要安居樂業，於是偽治安維持會應運而生了。偽維持會組織裏面的負責人物，除了一般流氓地痞之外，還有一般向來不與問世事的老學究死主們，所謂士大夫之流挺身而出領導。他們有着一個謬見：爲了社會的安寧，爲了人民的生命，不得不出而作有組織的投降，所以山西介休宋某做偽維持會長，老百姓竟然說：「宋大人是好人」！（見大公報通訊）另外是擁有厚資的工商業者，民二十七年春季安徽全椒縣偽維持會長（姓名已逸），是一個擁有近百萬資本的麵粉商人，由於他平日之樂善好施，很能博得一般老百姓的愛戴。固然他是爲了本身的利益，以圖目前的補救。殊不知苟安一時，什麼社會秩序的安甯，人民生命財產的保障，都是歸於幻滅的。那麼他們只昧於暫時的苟安，那裏知道什麼是民族氣節，什麼是國家安危民族生存之所繫呢？

我們展開了各方面的檢討，從國民心靈狀態反映到社會現象，進而去體認當前的政治環境，因爲我們的看法，許多枝節的問題是隨着幾個根本問題的解決而解決了的。淺明的意義，就是說：「上無道揆，下無法守」，那麼在社會上負責實際領導責任的人，既無憚於天下後世之公論，僅作個人利害的打算，又何能罪責於一般士大夫之無氣節，社會的是非不明呢？因此我們看到風氣的移轉，是依據於兩種主觀力量的：其一是暗爲移轉，以收到潛移默化的效果。這必須具備主觀的清明條件。一個政治家應該具有正己化人的氣概，要時時存在着「絕世獨俗」的襟懷，深恐一言一行之不當於義理，卽是以影響當時的

人心及後此國家民族的安危。其二是嚴明刑賞，俾良法美意能維持永久於不敝。如此紀綱不墜，有誰不兢兢業業？那麼社會止敗壞之氣習必日就消逝，人心必日以振奮了。質言之：我們要改造這惡劣的社會環境，這裏須要一個有恆久性的嚴明的法律裁制力量，所謂「刑亂國用重典」，當然不是一時的刺激作用能獲得完美的效果。另一面要以潛移默化的方法，轉移社會一般習尚，養成一種適當正確的獎勵力量。同時也得樹立一個新的道德標準，成爲一種堅強而持久的防制力量。這裏更需要培植健全而真實的輿論，指示人們一個共同遵守的趨向，掃除一切隔膜，燭照一切奸偽，有誰不刻刻振厲呢？這樣風吹草偃，國民精神便可逐步獲得根本的改造了。

由後者而言：中國歷年來內戰之不息，弄到全民族之奄奄無生氣，其唯一的缺欠，就是沒有一個健全的全國民族的領導中心。這個中心領導力量之形成，絕非偶然的，所以在客觀上必須深切體認民族國家當前的需要，鞏固民族的團結，採取適當的政策，博得全國民衆的愛護——一致建立和鞏固一個國家的中心力量。在平時國家的建設上，採取民族主義的政策，保護和調劑民族的利益，以巖新的姿態，構成爲近代國家的物質基礎，這樣才能形成爲近代的國民經濟的體系，這才能堅強一般人民對國家的認識和造成現代的民族意識。在戰時，尤其猝然臨到戰爭的悲慘命運，才能集中和發揮全民族的抵抗力量。不如此，便只有永遠陷於分崩離析的態勢，怎能抗禦外侮，以完成救國家保種族的任務呢？

在事實上，中國國民黨已形成為「抗戰建國」的中心領導了。我們要知道國民黨始終是一個進步的黨，革命的黨，假使停滯在某種狀態之下，會造成什麼險惡的局勢呢？因為一個執政的黨，最懼怕一批批新進的黨員，以黨為晉身之階，形成黨內的腐化——除了主義、領袖和少數幹部之外，幾於名存實亡，這樣根本與其黨的本身有損害的。同時引起在野黨派作地位的爭奪，更易形成普遍的失望情緒，謗怨叢興，這無異是引繭自縛了。現在為什麼會感到各方面的缺欠呢？政府方面也應該不要妨害在野黨派對於政治上善意的批評，盡量接受人民的忠告和譴責，不要以為罪己而橫肆壓抑，不要以為有傷體面而視為惡意中傷，因為在原則上，政治上的爭論，是可能推動政治進步的。這時我們要籲請政府，夙興夜寐，捐棄成見，毋分畛域，務其遠者大者，領導一切力量奔赴於此生死存亡的民族解放戰爭之一途。

中國當前的國難以及隱伏着許多內憂外患的問題，要憑藉什麼去解決呢？這完全需要堅固而剛強的領導中心，掃除政治上一切不信任的態度和根絕政治上種種不道德的行為，才能統攝全國人的意志，集中全國人的力量，堅確審慎樹立一個適當的國策，并忠實努力奉行以求貫徹之。相反的面沒有深淵的「民族國家利益之高出一切」的堅確認識，雖具有一個鮮明共同努力以赴之鵠的，意見分歧了，步驟不一致了，力與力相抵消了，便無形遲滯了國家的進步，阻遏時局的向上發展，而且敵人利用這一切弱點以施其分化與挑撥的伎倆，遂致為「親者所痛而仇者所快」了。因此要造成這堅固而剛強的領導中心，不

僅決於一二領導者之人格、才智、毅力、器度數者而已，尤在養成一團勤慎奮勉蓬勃向上的朝氣，使人得運用其心智毅力，奮其肝腦熱血，以完成時代所賦予的使命。這便是解決問題的總樞紐。

再進一步講：一個國家要走上憲政的常軌，應該具備些什麼條件？雖然實施憲政，已成爲舉國一致的呼聲了。但我們要問已具備這一切應奉守信約的真誠精神沒有？固然我們一刻沒有健忘民元以來搬演於政治舞台所謂憲政的醜劇，乃至憲法既不獲得適當的運用而爲人所御用，無異高揭救國救民之名而陰行其禍國殃民之實了，這自然不是憲治問題的本身。當着憲政將臨到實施之期，大家都能坦坦相諒嗎？我們懷疑到憲政的實施，會否會影響到這個民族中心力量的鞏固與發展嗎？我們都能真誠履行憲法上的信約嗎？大家祛除這一切疑慮沒有？因此當前須建立政治上互信的精神，掃除政治上一切不道德的行爲，培養良好的政治環境，爭取強固民心，以奠定「抗戰建國」必勝必成的基礎。

更進一步要掃除政治上的不安和混亂現象，走上憲治的軌道，這必須要一致建立并鞏固一個民族的中心力量，要杜絕「意見紛歧步驟凌亂」這一切敗亂的根苗，要使每一個有志之士毋踰越於民族國家的利益，——這必須構成各政治集團經常保有平靜而生動有趣輔車相依的綿密關係——黨的政策行動之折衷調和，黨的道德條件之存在，從事於政治活動的人與人之間，要造成適合於時代真摯的清道，民族正氣的發揚，社會是非的糾正，——因此這一切問題，都是一個最根本的「政治節操」問題。

政治上沒有節操，不注重道德的行爲，人心便日見陷溺，民族的自信力，更日見低落了。怎樣去培養「政治節操」，體肅政治風紀，當然不是一蹴可就的，這必須經過多少曲折反復的歷程，先於講明而後實行，一步一步做去，腳踏實地做去，有誠心，有毅力，更要有不姑息瞻徇的堅決態度，以嶄新的姿態，開創的精神，突破腐惡勢力的重圍，這才能使疲頑的人心，從頹廢中振作起來。我們要緊緊握住這一問題，不懷私意，不存偏見，竭盡每一個人的智能，要竭盡我們對時代應盡的言責，闡揚正義，發抒真理，俾「政治節操」能與時代的進展兩相映輝，這才能使中華民族從顛危艱苦的奮鬥中獲得永久的生存！

五 執政時代應有的警惕

(一) 國家權力的正確使用

我們翻開中國近代的政治史，長期處在北洋軍閥統治之下，弄到滿紙骸骨，這是一個什麼原因呢？就是專制主義毒惡的遺傳，誰據有國家的權力機關，以為就可以獨行其志為所欲為了。固然袁世凱的毀壞約法，背叛民國，已屬罪大惡極，但至段祺瑞又為什麼要大舉外債、極力擴張其武力政策呢？

我想任何主政者都不願使他的統治形成為一種罪惡，即以使貪使詐的袁世凱，也竟然槍決一個三千元貪污的縣知事。再論到徐樹錚曹汝霖輩之憑藉段氏，專恣橫行，又何嘗是其本願；其所以然者，是於不知不覺中，以為是「躊躇滿志」了。俗語云：「禍藏於無形，患生於所忽」，因為一個人最感缺乏的，是自制的修養，而尤難在有「自知之明」；許多晚節不終的人，並非由於他們具有驕矜暴戾的天性，或則不明公理正義所招致的。我們看到世界各國許多政黨沒有握著政權的時候，一種奮戰的精神，是如何值得人們的欽仰，等到掌握政權的時候，便於有意無意之閒生出一種驕慢的心思。這充分表現出：一方面是誇大，以為「予智自雄」毫無顧忌了；一方面是自滿自得，囿於一隅而不思進取，以為天下已治

已安了。這種行爲的動機可以看出兩方面：

從一方面去看，因爲國家內的衝突，是永久存在的，或則潛伏，或則明顯，或則爆發而爲公開的衝突，以爭取國家主權的使用權。因此握有治權的人，爲了政治的安定，不得不採用一種預防政策，消極的便只有用威力來抑制反抗，去維持表面的秩序，政治上愈見得動盪不安，而此種抑制反抗的手段愈來得積極，許多應興應革的事業，都病在習故守常，而止於維持現狀而已。在此種態勢之下，如果不能在「爭取民心向背」上加倍努力，惟憧憬於眼前局勢之不安，遇事不敢放胆做去；甚至估計的錯誤，各自的打算，不能從正本清源而獲得社會秩序與人心的安定，非至國家民族與本身兩蒙損害的最後結局而中止。

從另一方面去看：在這種偏枯局勢之下，遇事固執已見，乃至各懷偏見，這樣用人行政，無形失去了一個公平的準則。卽令官吏的任免，也不得不出於偏私，而國家所謂刑賞，一則藉公法以報一己之私怨，一則藉公法以示一己之私恩，以至偏聽，偏信，偏愛，一有所偏，而不肖之徒，遂得窺其隱衷：偏聽嗎？乃簸弄是非，變易聽聞，以啓媒孽、攻訐之漸；同時言路閉塞，視聽蒙蔽，那還有什麼是非之公呢？偏信嗎？人皆知有趨重之意，呼朋引類，遂開奔競鑽營之門。這樣心有所偏，則各懷偏見，各逞私意，只有促起朝野間的水火，所謂內在的矛盾與衝突，由潛伏而明顯，有時爆發而爲公開的衝突，所要

求於政治的安定，適得其反，那還有什麼「政績」可觀呢？

一般誤認政治上只有一種巧爲控制的方術，然而事實上外患未去而內在的隱憂又復滋長了，其癥結就在於我們如何去使用國家的權力。我們試想拿什麼來取得國家的權力機關？威力嗎？詐術嗎？這兩者絕對不是成功可持的永久條件，因爲沒有貫徹國是的誠信深入於廣大羣衆的腦海中，很少能使政局從此安定下來。簡單點說：我們要表現在政績上，確實在努力於人羣福利的增進，要使人民的願望少取得最大的滿足，所以國家而要求人民的服從，全視他的意志與能力，能否滿足人民的生活需要以爲斷的。所以納克氏說：「國家權力的根據，以及在正式法律外行使強制權威的權利，是以滿足人民要求這個責任爲原則的。」這裏我們一刻不能忘懷，國家的權力，斷不可由我們漫無節制的去使用。然則要怎樣去使用國家的權力呢？王陽明先生曾說：

「夫權者，天下之大利也，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水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忤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

這裏所講致權之道，就是教我們如何去使用國家的權力。許多沒有政治道德修養的人，一朝大權在

握，這無論表現在那方面，都比較是平凡的，唯一的，是病在沒有誠心，不能泯除私慾，便於有意無意之間，產生濫權覆職的行爲出來，可能造成的惡果：其一是造成隔膜之治，而樹立朝野間的森嚴壁壘；其二是與羣衆遠離，形成政府與人民脫節的現象，雖欲盡力來擴張政府的能效，止於維持片面的秩序而已。因此我們應該提高其警覺性，時時刻刻要懷於「總裁給予我們血忱的昭示，不可憑藉地位，濫用權力，而導致施政上嚴重的惡果，這是於「抗戰建國」有極大的損害的。

更具體點說：一個統治者而需要人們的擁護和愛戴，更需要羣衆報以狂熱的歡呼，這就很愉快的表現其統治的效果。但是相反的得不到大眾的信賴，而且羣衆在處出以忍酷、幽默、鬱抑的表情，這又充分證明了統治的能力不夠。這時我們對民衆是憎恨、抱怨，還是去反躬自問，而求所以不獲得人民擁護與愛戴之故呢？這就是說：一個執政的黨要鞏固其國家的統治，擴張政府的效能，完全建築在羣衆的信仰上，如果僅僅以一種治權來強制國民，而不以一種主義和工作來領導國民，這種信仰是建立不起來的。也就是說：從施政的政績上來造成強固的信仰，而不是用教條法令來強制人們服從所能奏功的。

(二) 如何培養奉公守法的吏治風尚

中國政治不進步的最大原因，就是沒有養成奉公守法的吏治風尚。追源禍始，就是民國開創之初，

未能移風易俗，仍然是順着滿清貪污腐惡的官僚政治的覆軌而邁進的。可以說：無良好的風氣，政令必不能行，也就不能形成爲廉能的政治。因此，總裁會沉痛地說：

「我們過去一般政治上的弊病，嚴格檢查起來，實在很多；但最根本的一個弊病，就是在行政上一般公務人員對於命令不能貫徹，——以致一般機關辦事，往往接到上級的命令，陽逢陰違，得過且過，而上級對下級發命令，內容應如何規定，纔是切實可行，下級接到命令之後，對於命令的意志，能否完全了解，以及如何指導監督考察，纔能澈底作到，這一切都沒有顧到。——如此無論怎樣良好的命令，怎樣完善的計劃，都不能實行，發生效果。這些毛病從清末沿襲到現在，四五十餘年，幾乎成了痼習，從來沒有人認真注意，來澈底改革。因此一般機關和社會，都視命令如具文，而各種報告，更是敷衍塞責，任何良法美意，都不能推行，民生福利不能增進，而一切政治腐敗，社會積弊，都由此而生。」

我們看中國政治史上最醜陋的一頁，就是許多完善的制度和法令，成爲一紙具文，并非限於政府機關的不健全，用人行政之失其依據，全憑私意與偏見；政府的政策從未超越於現代的需要，而不着邊際。嚴格說來，就是沒有守正不阿之士行使其政策。然則要怎樣去糾正這種惡風而養成奉公守法的優良的吏治風尚呢？

第一重在政治的實際措施而不重在粉飾鋪張，以免形成空洞虛浮的現象。因為要使「治績昭著」，是需要事實來表現的。一個主政者惟恐一言一行，不足以厭天下生民之望，惟恐「一夫不耕，或受之飢」，「婦不織，或受之寒」，一事之不得其宜，一夫之不得其所，而養成一種與斯民相對於骨獄血淵之關的心理，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為開」，那還憂「政績」之不可觀嗎？

我們知道在沒有取得政權之前，應該努力宣傳自己的主張，以期獲得廣大羣衆的同情與愛護。既取得政權之後，就有一切推動實行的便利，施政的「政績」，就是有力的宣傳，捨棄施政政績的任何宣傳，是難令人悅服的。僅只過分高度的宣傳，其結果是：一方面高尚政治目的的達成，絕非一蹴可就。因此過度的宣傳，必於隨時隨地喪失其威信，弄到言行不符，最易引起人們的失望，以至生出怨望，所以反對的羣由與意見，是有值得自行檢討的必要的。另一面是無形使羣衆的感覺遲鈍了；同時可能使本身也於不知不覺中模糊起來，而缺乏政治上應具有的警覺性，會一天天腐化而走向貪鄙苟安的途徑上來，不是措火於積薪之上嗎？

總裁所昭示的行政三聯制，其最大的功用，就是側重在工作的效果，因此我們對政治上的任何措施，自己去嚴加檢討，不容有絲毫諱飾的地方。黃旭初先生說：「怕對工作執行檢討的人，就是對工作最不忠實的人」。這就是說：我們的一切措施，只有嚴格的去執行檢討和批評，才能完成我們的工作使

命。因爲任何一種正確周密的計劃的實施，不能保其必無遺憾。從檢討中指出工作的優點和缺點；只有從不斷檢討中，才可能保證計劃的完成；也只有從不斷檢討中，才能集中領導，加強領導。否則我們不注意工作的效果，不重在政治的實際措施，而惟鋪張粉飾之是務，那麼內心上便充滿着虛偽和驕弱；一則懼怕人指摘他的過失，力圖遮飾，這樣便使真言不入了；一則陷於自滿，固於一隅，而使局勢不獲向前開展了，這還值不得我們深深地警覺嗎？

第三要獎勵廉隅，肅清貪風，以造成廉潔的政府。我們要努力於政治的改革，就要肅清貪風，即令治績昭著，有一如此，已足爲盛治之玷，何況普遍呈現貪婪無恥之風呢？明朝的亡國，謂其亡於馬士英阮大鍼之招權納賄亦可。因爲貪政養奸，是令人非常驚心觸目的。營私舞弊影響之所及，行政效率由此而減低了。許多富國利民的美政，反由此而變成禍國殃民的弊政了。因此在苛征暴斂之下，迫得人民不安生業，流爲匪盜，流爲漢奸，造成政治上社會上的動盪不安，又何一非貪政養奸暴政養奸的結果。我們整天在這裏高唱「剷除貪污！」事實上貪污之所行所爲，未曾絲毫斂迹，反而愈見披猖了。這是一個什麼原因呢？

我們僅止空洞來勉人不爲貪污，是收不到效果的。一般人總覺得「貪官易作，廉吏難充」，就是做廉吏的結局，只有悲憤、鬱抑，以至貧無以自存；所以王陽明先生曾說：「夫貪污者，乘肥衣輕，揚揚

自以為得意，而愚民競相歆羨。清謹之士，至無以為生，擲黨鄰里，不知周恤，又從而笑之。」這種薄惡的習俗，無異是獎人為貪。昔賢顏光衷先生有一段「居官者，豈不知廉潔是尚，第習見營官還債，饒遺薦拔，非此不行；積久日滋，性情已為芬釁所中。」的話，可知貪污之所以為貪污，還有一層社會關係。那麼要肅清貪風，單靠法令的消極制裁，是無濟於事的，必須有一種制度，能扶助善類的成長，改正人的錯誤觀念，掃除社會薄惡的習俗，所以止人之貪，就要獎勵廉隅！

總之，我們勉於為善，心理上不能難以絲毫不純正的作用在裏面，今日而要建設廉潔的政府，肅清貪污，試問有幾個廉潔自愛之士，受到了國家一些什麼恩寵，而貪污之徒，又會受到了國家什麼嚴厲懲罰？固然國家防制貪污的法令，是非常嚴密的，但是這種法令的制裁為什麼有時而窮呢？共一一個主管官自己能廉，能防範人之不能廉嗎？他的左右親幸之不為貪污嗎？我們讀廣西天峨縣長莫漢揚在監自縊身死的絕命書（皇主席）中「用人不慎，徇情過當，竟至不能自拔，有玷官箴，……個人清白，可告神明。」的幾句話，這不僅是對莫縣長個人的痛惜，而是貪污的檢舉，倘沒有成為制度化，而變弊營私的技巧日漸週密了。共二倘沒有破除官官相衛的陋見，為了瞻徇情面，即有貪污的事實，亦未能揭發。我記得去年湖南會槍斃長沙湘潭田王兩個貪污縣長，轟傳一時，但事後在輿論上：一則曰身後肅條，一則曰素稱廉謹，這樣就是被懲處的未見得真貪污，但相反的面貪污的程度有在人十倍百倍之上的，到落得消

違法外，不算爲希罕的事實，這樣怎能肅清貪風而獲得吏治的澈底澄清呢？

第三要尊重職守，綜核名實，以造成名實相稱的政府。國家設官分職，是從事實的需要來決定的，那就要各自明白其本身的職掌，不相侵越半分，努力於本身份內所應擔負的義務。這裏我們去看與登堡將軍膺選爲德國大總統對保皇黨說的話，就使我們領悟到如何才算竭盡忠貞於職守了。因爲德國保皇黨的人們，以爲與登堡今日當選爲大總統，明天帝制可以復活；但與氏就職後，正和他們的預期相反，因此他很嚴正的說：「你們說什麼？我之爲德意志共和國大總統，是由國民選舉的，你們希望帝制，去選舉別人吧？」又說：「我是德意志共和國大總統，只知道國家的利益，我是慣於嚴守職權的。」這樣尊重職守，恰當於在我職權範圍以內所能做到的事，或必須要我做的事，盡力以赴之而已。

我們要知道忠於職守，做到不爲貪污——濫權廢職之外，還不算爲稱職；這必須要竭盡其智能，以完成其份內所應擔負的義務，才算稱職了。所以廉與能是相提並論的，廉是不貪污，能是負責任，但是要如何才能做到負責任呢？晉賢狀在倫先生說：「夫服官而廉，猶之爲女而貞，此其本分之常道，而非異人之奇節也。今日要廉，卽此要之十字，便將自負以矜賢。上或有弗禮焉，則自負曰：『吾廉如是，而何弗我禮也？』由是不耐煩以承上，而做所不免矣。下或有弗順焉，則自負曰：『吾廉如是，而何弗我順也？』由是不耐煩以卹下，而暴所不免矣。或值不速之客，或當難辦之務，則又自負曰：『吾廉如

是，是自樹矣；世人何足禮，淺鮮事無足慮也。」由是不耐煩以酬世職務，而惰慢褻職，所不免矣。」由此可知，我們要做到負責任，就要對工作有耐性，朝夕惕勵，忠於所事，以求毋忝厥職！

我覺得國家設官分職，組織之繁密，員額之衆多，上而封疆大員，下而牧守佐雜，究竟人人都盡到他應盡的職責嗎？我們就拿監察院派遣的幾位大員來說，他們勤勞自勵，僕僕風塵的結果，撤懲了幾個貪官污吏，把監察的權力提高到了什麼程度？再拿這許多爲國家賢良有司的縣長先生們來說，他們人人都稱職嗎？誰個從愛民養民的根本意義上稍一尋味，他們僅管說：「政務繁劇」，事實上收到了些什麼「實政惠民」的效果？等而下之，許多憑藉地位以濫權濫職的人，甚至囤積居奇，操縱物價，發國難財，坐擁厚資，他們何曾顧到「國計民生的福利」，又何曾在心頭上絲毫存着一點法紀的念頭，這一切都是不明職守或不忠於職守而形成的。

我們在今天確曾見到許多名實不相稱的地方，就大體上來說：一方面是權責不明，弄到彼推此諉，坐而廢事，貽誤功令，徒擁虛位而已。又一方面因人設事，不期然而增添許多駭枝及附庸機關，虛糜公帑，無補實際。另一面病在習故守常，不能拔選真材，裁汰庸愚，乃使驥騫同阜，羣習爲偷惰，不自振作，徒隨緣了歲月而已。固然在許多方面是進步了，但「積重難返」仍不免有許多敗壞的現象，因此大有可能造成的險惡結果：其一是行政效率日見低落，有關於民生福利之政策政令，不獲忠實努力之推

行；同時病國病民之弊政，又無從根絕，形成疲頑不振之狀態。所以曾國藩說：「積翫之後，須振之以猛。」這非用大刀闊斧的手段，來謀得澈底的振刷不可。其二朝野隔膜日深，失去羣衆的愛戴，僅以威力來抑制反抗，維持表面的秩序；但一朝禍胎包藏既深，爆發必烈，終其極形成社會的大擾亂，社會秩序與人心，將無一所恃了。但至今日國家失去一重心，再能建立一個重心嗎？國家的組織既經破裂，好容易再能謀得統一嗎？如果不能綜核名實，怎能擴張政府的效能，鞏固國家的統治呢？如果不能使政治迅期走上軌道，所謂蓬亂萌，清反側，從何下手，又怎能使戰後的社會基礎重新建立，社會秩序和人心怎能安定呢？這便是治亂安危的契機了。

(三) 一個政治家應具有光明磊落的態度

一般功利思想，薰醉於人心，便把國家的權力，視爲囊中物，因此許多在行動上，就充分表現出狹隘偏廢的地方，而昧於國家大義了。這裏就事論事，本黨在今天居於「抗戰建國」的領導地位，這絕非偶然的事實，有了博大精深的主義，又創建中華民國的光榮史實，但我們每一個黨員，就要平心靜氣來自己反省一番：怎樣才能建立和鞏固民族的中心力量？怎樣才能完成救國的任務？總理遺留許多寶貴的革命條教，總裁給予我們血忱的昭示，我們都能虔誠恪守、始終不渝嗎？假使我們有不少的黨員，

外面是奉行主義，信仰領袖，而在骨子裏作毀業主義，哄騙民衆的勾當；尤其是把黨視為利己自便的工具，把主義視為升官發財的敲門磚，這種潛身藏形的腐敗行爲，還不算是最嚴重的失節嗎？因此我們要作一個革命黨員，要有革命黨員的氣節，尤其是在朝而握有治權的黨員，起碼的條件，要具有一個通常政治家所應具有的光明磊落的態度。

第一一個政治家的出處，是有目的的，而不是盲目爲着一時的利害與權勢，尤其當着民族國家千鈞一髮的時候，能望其「捨生傾危」的地方，就要全視其「操心危慮患深」之一片愚忱而已。因此我們的出處要決定於下列三個原則：

1. 見其可爲而出之，見其不可爲而引領去之，抱定「合則留不合則去」的原則，不存絲毫猶疑而微倖的心理，所謂「功名利祿」，要有棄之若敝屣之慨，實不值一顧。
2. 如見其有可爲，應具有「挺身而躬履危難不辭勞怨」之精神。值此時機，苟主政者受制於左右近習，要能力排衆議，不可坐視淪亡於不救，以視國亡民瘼爲不干己。
3. 如見其事有可爲，而勢有不可爲，則須退藏以待事之定，不可稍露鋒芒。偶一不慎，則與人爭名爭利之嫌，而遭迎頭痛擊，因此須有「與物無競與世無爭」之氣慨。

這裏我們可以舉一段史實，就是北京政府第一任內閣唐紹儀氏之拂袖而去，在袁世凱直視唐爲其所

黎養的走狗，但唐之視察却有一種新的看法，其根本精神：其一認爲無當於義理之作爲，輒面爭不屈，相反的繼唐而組閣的陸徵祥，在當時以所謂超然內閣出現的，但由其馴服如羊，不明是非黑白，而激動參議院提出陸內閣的失職案來。再由陸內閣而變爲趙內閣。趙秉鈞既然其袁氏的私黨，其事仰承袁氏軍旨，宋案發生而成爲刺宋案的重大嫌疑犯，後知爲法理所不容，乃迫而服毒自盡了。其二絕不放棄其實任以內的權力，而爲事勢所牽就，與時俯仰。但一視當時所謂第一流熊內閣（熊希齡），不惜幫助袁氏毀壞國會，分明是走到憲政軌道以外去了；要知道唐氏與袁有二十年的舊交，因爲袁不肯循憲政軌道，甘願犧牲個人交情和袁破裂，至引領拂袖以去，可謂明於去就進退之分了。

我舉這一段史實，並不是以爲唐氏處事的態度，盡能適合於今日，而且我們今日處事的態度，正復相反，因爲我們在上面有英明果斷的最高領袖——總裁，翊贊中樞的人，除了力圖振奮驅勉供職之外，別無所謂去就問題。外而各地方領袖，盡能遵循總裁的意旨，在「抗擊建國」的一個總目標之下，更無所謂去就問題。不過在當前不可避免的人事磨擦的複雜性，許多明智之士，都感覺得難以自處，如果我們抱定一種直率坦白的態度，便見得到處碰壁此路不通，難道這就是天下事無可爲嗎？本來在一個大前提之下，從各方面專誠精一的努力，誰都可以貢獻其能力於國家社會，尤其是我們一個忠於三民主義的信徒，應該要效忠於黨；但往往以過高的熱忱，反遭致人的疑忌，當然這不是偶然無故的，所以在

許多繁複情節之下，仍不免有「忠而見疑信而見誘」的現象。固然一般青年病在對工作沒有耐性，有時我們對人對事也應該曲盡忠誠的，但在某種場合之下，既不安於工作，便不得不忍痛而拋棄工作，迫於一走了事了。

第二個大政治家要處處示人以大信，以端正社會趨向，樹立賢明楷模，而達到正己化人的目的。我們總理無往而不昭示人以大信，當民國開創的一天，已經被選為臨時大總統了。但在和議進行中，我總理即宣佈清帝退位時，即辭臨時大總統之職，並舉袁為大總統；和議告成，清帝退位，即實踐其諾言，於同日咨達參議院辭臨時總統職，並推荐袁世凱請舉為繼任總統，絲毫無留繼權位的餘地，這種「天下為公」的坦白胸懷，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執政的人物所少有的。我總理為什麼要處處示人以大信呢？總理會說過：「何以本黨在南京之時，便那樣興盛，此刻在廣東反不如前呢？原因就在本黨份子之此刻過於複雜，黨內的人格太不齊一，令人家看不起，所以人都不願意來加入，幫助本黨來奮鬥。」這裏我們要知道趨重勢力與慕風向義是兩途的，我們要求人的信賴，或則能施以詐力及其不正當的誘惑，可能聽命於其鞭策之下，但此役使人的一點原動力，却是權利，權利的結合，是一時性的，而不是真正的心悅誠服；有利則雲合景從，利盡就鳥飛獸散，因此一個主政者以利誘脅迫來樹立幹部，那是天下至愚至拙之計。

這樣爲了使統治能力的加強，政府能力的擴張，就是要求在政治上負責實際責任的領導者，能以身作則，端正趨向，使人有一個效法和取捨的地方，這就是我們要求樹立一種很賢明的工作作風，和改變一種不良的工作作風，就要上層領導者在行動上能造成一個偉大的示範力量來，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認清一種事態的因果關係，什麼問題便迎刃而解了。在這裏我們很明顯的可以看得出來：假使我們本身不能廉，怎能要求人之不爲貪污呢？我之不能以誠信待人，又怎能要求人家以誠信待我呢？如果要開創一種新的風氣，就需要以身作則，做出一個好的榜樣出來，這就是「身教重於言教」的道理。再反轉來說：一種不良風氣的習染，也就是上層領導者一種行爲上的反應。譬如喜譽惡毀，而諂諛逢迎之徒以進了。又如性殘好忌，而中傷挑撥，構陷羅織之風大作，這樣天下靡然向風，也就是「上無道揆下無法守」的道理。

更進一層說：我們以身作則，正己化人，不僅能使本身一天天健全而充實起來，同時這樣感化力量，能從令人的不滿而使人感到滿足，許多懷恨失意份子都逐漸消逝了。這裏我不是說要如何去嘉惠士林，而是在事實上正告人這種賢明的統治，在羣衆中已樹立起強固的信仰，非任何煽動、陰謀、搗亂，所能達成其企圖，滿足其在政治上熾盛的支配慾的，而無形降低其嫉惡和鬥爭的勇氣了。那麼不如此存心，僅而不擇手段，來盡量使用誘惑或脅制的方術，是很難收得良好的效果的，因爲此種惡風氣感染至本

身的時候，同樣會使本身因此削弱而動搖不安起來，所謂「視人以妾婦之道，人皆以妾婦之道報之。」等到自食其果，那就悔救無及了。所以我們要以身作則，端正人的趨向，就要愛人以德，不可陷人於不義，才能達成正己化人的目的。

第三一個主政者要具有公正平允的心腸，不偏私，摒棄愛憎，不存喜怒，才能達成我們高尚的政治目的。從政的大道，就是任何事物的處理，要以「公平正大」的心理為基礎，要「心平氣和」，才能衡量事物的輕重。為政不能「公平正大」，遇事不顧輿情，不恤人言，一任自己的好惡，以為施政的依據，這必於專橫跋扈，為所欲爲了。從較好的方面說，自己止於不爲惡，而不能止人之爲惡，這等於教唆人爲惡，或縱容人爲惡，因為心有所偏，不得不姑息瞻徇情面，徒示恩於一人而貽禍於大眾，這不是至堪痛惜的事嗎？本來一個人做到不偏私，摒棄愛憎，是極難能可貴的。通常在一般人的志氣上，行爲上可以品列爲三類：

1. 上人之資，正如呂新吾先生說：「以天地爲心，爲生民立命，心思既竭，仁愛無窮，必使乾坤清泰，海宇安康，無一事不極其妥貼，無一物不得其分願，而後其心始遂。」這都導源於一點不忍人之心，所以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忍人之政。」乃認定「仁民愛物」爲其本分應盡之天職。

2. 中人之資，如認爲「潔已愛民修政立事」，名譽既可日彰，勳業又可日隆，當可勉於爲善；但雜以利心，既畏譏讒，又懼損斥，遇事不得不曲循人情，而心存偏私；所以中人之資，是可與爲善也可以爲惡的。

3. 下人之資，從好的方面看，雖有向上之志，而無愛民之實，或短於才，不得不爲人播弄或欺瞞，卽令他本身不能爲惡，而其耳目爪牙爲虐於人民更甚於其本身；或疏於行不自檢束，人伺其隙，則設法以餌之，無形墮入奸人術中，所以好人也於不知不覺中變成了壞人。從壞的方面看，專在利心慾心上作打算，如何可以固結權位，博得寵幸，只此看得天下生民與我分毫無干，所謂「多得錢好官我自爲，笑罵山人笑罵耳！」

這樣，我們如果不具有高遠的志向，勢必日趨下流而心存歪曲和偏私了，但爲什麼一個人不容易透過此一關自私自利的寸心呢？從用人的方面，有了一個私心，便不能綜核名實，所以黃旭初先生說：「大抵主觀的私意和偏見，多係自是之見，未可全信；所以選用幹部，務必平心靜氣，不可偏私；但問被選者是否賢能，至於是否合於自己主觀的尺度，抑應一概不問。他如雜以私人愛憎，則更非選用幹部之道。」又說：「近來主政者，或多以附己者爲用人標準，不但不論賢否，並且不必論能否，甚而至於從利誘威迫中以求樹立幹部，造成社會寡廉鮮恥，奔走鑽營的風氣。」從對人的方面，心有偏私，不得不

有愛憎與喜怒，乃至黨同伐異；究之黨同伐異，乃是起於謗言蜚語，不自檢束，各執己見；假使本身健全，無可供人指摘，任何詎譎橫議，必於不攻自破了。老實說：我人之所以有偏見，便是無法透過此一關自私自利的寸心，因此這種利己心的發展，最易造成事與願為的後果，所以當握住政權的時候，就要具備一付公正平允的心腸。

更明顯點說：由於利己心的發展，便時刻存着一種妄自尊大的心理：爲了攫取世界上第一等榮譽，便不惜忌功害能，爲了保持而企圖鞏固其一己的利祿起見，更不得不以種種卑污的手段以達成其目的。於是弄到是非不明，以愛憎爲喜怒了，不得不引阿附順己者爲之黨援了，也就不得不冀求我一人智而衆人皆愚了。我們怎樣去辦得一付公正平允的心腸呢？其一心要公正，不偏私，自己心中不能雜着絲毫私念，並要忠實接受人的批評，而且本身要經得起批評，當然一種信口雌黃毫無理由的意見與方案、妄肆抨擊的一種反動宣傳，應該有撲滅的必要；那麼對於具有反對的理由與方案，應該平心靜氣的自己去檢討一下，有應改革的地方，要毫不猶豫的改正過來。其二是心要平允，遇事抑制情感的衝動，不可挾持成見，不可動生忿怨，任何事務的處理，要得之於心平氣和，不躁急，不慌亂，有層次，有條理，絕不因一時一事之衝動而貿然嘗試，自然嫌隙不生，可以杜絕奸惡的潛滋暗長了。

六 在野時代應守的信約

(一) 幾種錯誤的心理傾向

我們要如何去立身於野呢？張厲生先生有言：「余以爲君子處此亂世，力能匡救，則救之可也；否則，宜遜迹山林，立德立言，以爲世則；且以作來者忠義之氣。若既立身於朝，食國家之祿，當死國家之事，決不可隨俗浮沉，苟合取容，視國亡民瘼，爲不干己，此士君子立身行道之正則也。」（見中國之民族思想與民族氣節——青年書店出版）這幾句話就明白劃出了在朝在野各自努力的一條界線。政治的隆污，固有賴於在朝之士，能忠實執行其既定的國策；實踐其諾言，更有賴於在野之士，具有一種維護正義的堅決而正確態度和意志，不可以爲在野就抱着一種消極態度，正因爲立德立言，是一種積極的行爲。

我們如果自承有這種維護正義的堅決態度和意志，但也得認清時機，主客觀的條件，看我們所採的態度是否正確，是否裨補於大局，因爲我們民族具有一種儒家「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的潔身自高的先入之見，形成一種偏僻、孤傲、自滿自大的謬妄心理；其一是偏重意氣而不是講氣節，這樣便加重對人的

譴責和輕蔑，以爲憑其在野資格，橫肆謾罵，不負責任，同時覺得對於現執政的不滿——表示不信任，便於有形無形之間可以增高其身價，認爲這樣就可以博得民衆的好感，將來就可以取得政治上的領導地位——作另一時代的主持人物。如是彼此這樣相待，朝野隔膜一天加深一天。其二遇事存着人我之見，當然這不能偏重責備於在野的一方面。因爲這樣只有主觀的認識而忽視客觀條件的存在，那麼弄到彼此不能相諒，遇事齟齬，還能談得上朝野間什麼適當的情誼？彼此既不能互信，便需要相互牽制，互相防範，因此政局的不安定，以造成沉悶鬱抑的局勢。這是我們應該認清的第一點。

我們知道更有幾種變相的心理傾向，是由於急切爭取政權而起的。我們看到政治舞台上只有陳腐一幕一幕的重演，而不會在實際上改換一付頭面；因此一般表現得無定見，無主義，忽而革命，忽而反革命，在所謂打倒與擁護的方式之下，以逞其變幻莫測的手段而遂其利己自便的私圖了。這樣在野人士爲了急切要接近政權或取得政權之故：乃若隱若顯亟謀在羣衆中樹立足以與現執政對抗的實力，然而實際上只有虛聲，骨子裏却異常脆弱，但在執政的一方面，不得不迫使其安於故常，任何革新事業，均無從着手。其二表現一種相反的心理傾向，便是遇事遷就，只要有可以接近政權的機會，不稍猶豫，便可放棄其主張與其根本的立場，但是一朝不滿，也毫不猶疑地揭其反對之幟，甚或利用一切局勢以圖發洩其忿怒，什麼氣節，連國家的體面都可不顧及了，這是我們應該認清的第二點。

這樣有了這兩層癥結，不僅要引起朝野間的隔膜，同時還要影響到社會的視聽，而造成「正義磨滅，民氣消沉」的惡劣現象。因為過分的褊激，並不足以濟當時之窮，反足以增人憎惡，而引起無意味的紛爭與矛盾；尤其當着嚴重的敵國外患的時候，重於個人意氣，便昧於國家大義了。在躁進的一方面，時刻在作個人進退出處的打算，自守不固，不能貫其一貫的主張，天下還有什麼是非之公呢？至於驕熱的一方面，更易形成消極頹廢的現象，那裏能盡其在野的職責呢？這樣表現在社會上意識模糊，更無是非之公了。現在我們從各方面來看：

從褊激的方面去看：他們僅而過分的抨擊政府——橫施謾罵，不負責任，其出處是為發洩自己的忿怨，還是想在一補偏救弊——以圖振濟當時呢？如果為圖發洩自己的忿怨，不擇任何手段，但是一個具有正大政治立場的黨派或是一個具有遠大政治卓見的人，就不應該有這種褊激的態度。因為我們只過分的抨擊，指摘人家，但是等到自己上台，又依樣畫葫蘆；所以在羣衆的心理上，對於這種浮議，只感到一種厭棄；如果我們為圖匡濟時艱，就應該審慎放慮我們的一言一動，是否足以濟當時之窮。還要顧慮到所能給予後時的影響。假使我們不度德量力，不能克服當前的險惡環境，反為當前的險惡環境所制服，在本身最易削弱其工作的勇氣；雖然我們有死國事的決心和勇氣，但要死得其所，死當其時，所以一種褊激的言論和行動，徒然增人憎惡，是無補時艱的。

從躁進的方面去看：他們總覺得人家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可能自我而獲得恰當的解決，有時雖然也會提出若干漂亮動人的口號，但是看到有利可圖的時候，不得不棄其所守了。因此便無暇去選擇手段，乃不得不走歪曲路綫而達到自己升官發財的目的。但我們也不要認為躁進的份子，都是急功好利的小人，不過對時代認識不真，所守不固，往往社會上可能表彰而出的公理正義，均為這種急功好利的浮僞行動所混淆了，因為一般總覺得外面講公理正義的人，骨子裏不過是爲了它一己不可名言的私利。同時由於躁進，所守不固，認識不真，又易形成其失望，有時會不免變成反復無常的小人。

從輾轉的方面去看，并不是一般不明是非，而是事實上在避免是非，這是由於民族的傳統習性而來的。我們看到揚博報孫會宗書中說「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的幾句話，可見其用心之良苦了。又如鄭板橋致其弟書中有云：「暇日研碎米餅，煮糊塗粥，雙手捧碗縮頸而食之，得此足以週身溫暖。吾其長爲農夫以殞世乎！」更從陶淵明的「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幽獨思想看來，這完全是在專制政治壓抑之下，人皆知所趨向，所謂「沉緬於酒色」，「娛情於山水」，一般均缺乏進取的遠志，同時由於民族性的過分昏明——禍福太明，往往非笑人的徒勞，更使人畏葸不前啦。

在今日我們可能看到反映於在野各方面的一種浮躁、淺識、消極、悲觀、頹廢的現象，是否須要振

作起來，而開創新的風氣呢？既然一種褊激狹隘報復圖逞的行動，無補時艱，那麼一種冷眼觀世的幽默態度，社會既無是非之公，人心無從振奮，還能令我們坐視國家淪亡而不一顧嗎？我們要論到今日險惡而嚴重的局勢，其根本癥結所在，還是由於我們在野之士普遍對「國是」缺乏一種真誠的態度，這就是說：論事只重枝節，而不能集中力量與意見於一個根本問題的方案上，也就不能引動全國朝野上下努力於一個根本問題的改革與調整。弄到枝枝節節，意見紛歧，既然輿論的指導不健全，許多問題，都單憑其臆說與私見，同時拿一個爲國家民族爭生存亡的問題，只看成其爲發洩私忿，恃以爲攻擊他人之具，或假此以立名，弄到言路廝雜，聚訟紛紜，非至坐待國亡種滅而不止。我以爲澄清當前的局勢起見，非要消除朝野間的隔膜，建立朝野間的適宜情誼不可。其關鍵就是我們每一個在野之士能把這一切褊激、躁進、輾熟的行動迅速地糾正過來。

(二) 立德立言的幾個基本信念

我們在野之士，不要以爲投閒置散，就抱着消極態度，正因爲「立德立言」，是一種積極的行爲，但要如何法立德立言呢？風氣的養成，是有賴於先知先覺者率身躬行的倡導，所以他的功效，有著稱於當時，也有收效於後世的。我們看有明一代，雖在誅鋤剪滅大燭其柔弱民氣的惡作劇之下，但至宗社傾

危國將新之際，不少忠義節烈之行，竟卓絕千古。推其根源，則爲正學陽明諸儒維持世教之力，有以啓發。因此明儒黃黎洲先生論方正學曰：

「神聖既遠，禍亂相尋，學士大夫，有以生民爲慮，王道爲心者絕少，宋沒益不可聞。先生稟絕世之資，慨焉以斯文自任。——既而時命不偶，遂以九死成就一個「是」，完天下萬世之責。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學者也。考先生在當時，已稱程朱復出，後之人反以一死抹過先生一生苦心，謂節義與理學是兩事，出此者入彼，於是成仁取義之訓，爲世大禁，而亂臣賊子將接踵於天下矣！——惟先生平日學問，斷斷乎巨盡忠，子盡孝，本於良心之所固有者，率天下而趨之，至數十年之久，幾欲風移世變，一日乃得透此一段精光，不可掩遏。蓋至誠形著動變之理宜然，而非人力之所幾及也。」（明儒學案師說）

就近的功效而論，則爲排滿革命運動之風起雲湧，有人倡導於前，便有人繼起其後，前仆後繼，遂使「慕風向義」之士，不謀而合，而造成許多可歌可泣的壯烈犧牲的偉績出來。譬如在當時保皇黨人揭舉其立憲的旗號，轉移種族革命的視線，因此爲革命黨人所痛恨，故有先烈陳天華之蹈海，其絕命書中有言：

「——革命之中，有置重於民族主義者，有置重於政治問題者。鄙人所主張固重政治而輕民族

，輕於鄙人所著各書自明，去歲以來，亦渴望滿州變法，融和種界，以禦外侮。然至今則主張民族者，則以滿漢終不並立，我排彼以言，彼排我以實，我之排彼自近年始，彼之排我二百年如一日，我退則彼進，豈能望彼消釋嫌疑而甘心願與我而共事者乎？欲使中國不亡，惟有一刀兩斷，代滿洲執政柄而卵育之。——」

這樣痛祖國沉淪，而又有姚宏業烈士之蹈江，那時禹之謨在湖南，無時無刻不以轉移士風砥礪名節自任，不但對於農工商賈各實業之身先提倡，日不暇給，而於國權領土之喪失，不惜奮力電阻或爭回，更不惜醫所有以謀公益，故一聞陳姚二烈士之蹈江蹈海幾至痛絕，乃議葬嶽麓山，爲全省矜式，雖在偽官吏及頑紳堅決反對之下，毅然以身當其衝，是日送葬人士達數萬，湖南民氣之盛，無過於此時，卽後此湖南民氣之激昂，亦不能不說是禹之謨爲之先導了。

我們由此可以說：「風氣之養成，其勢在遠而不在近，在微而不在顯。」（張厲生先生語）但一朝蔚然成風，便具有排山倒海之勢了。辛亥革命的成功，誰說不是由於我先烈相激相蕩具有前仆後繼的犧牲精神呢？又何一非我宋明諸儒維持世教之功乃至成爲我種族生命之潛力呢？這便決定我們在野之士之宜如何立德立言啦！

我認爲「立德立言」，是併行不悖的。許多「言不顧行」的人，僅在一時盡可能發洩自己的忿怒，

盡可能來力求吸引羣衆的視線，根本就沒有連想到如何來求實踐在自己的行動上，因此他就只能發出空洞的議論，所以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既然顯示不出「匡救時病」的力量來，而且攪亂了羣衆的視聽，怎敢輿論不脆弱呢？

我以爲當前在野之士，有一種最惡劣的傾向，便是抓住青年爲其鬥爭的工具。尤其是要求政權最迫切的人，在他們的內心上：其一以爲可能表現出的偉力足以使政局的播弄和不安，不能不持有若干羣衆爲其鬥爭的工具，其骨子裏隱以此種態度爲其討價還價的張本。其二既然這樣存心利用青年，對於羣衆的爭取，是患着急性病的，根本就沒有顧及到幹部的才智、能力與氣節，他們僅祇要求幹部搖旗呐喊助助聲威而已，因此存心利用青年的，只要個人的權威鞏固，升官發財的目的一經達到，便可拋棄青年，甚至爲了達成一己的私慾，不惜斷送青年的前途，犧牲青年的生命，那還不是國家民族的罪人嗎？這又怎樣談得上立德立言！

我們怎樣立德呢？首先要確認「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根本信念。因爲一般看成得失意的官僚政客之卑下無恥，當然隨時隨地置國家民族的利益於度外，只要稍具有良心血性的人，一切的行動，就應該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爲中心。一種不合理的行動，便應該馬上停止下來；不然我們僅憑一點意氣的衝動來製造分歧，增厚政府的困難，或者要使政府感到棘手，都有損於抗戰全局的。這就是說，我們不能因爲

對人的譴責，而使政府孤立起來，就是因人的問題，不能影響到整個國策的執行，尤不可動搖國家的中心。現在不是我們要求統一，而敵人來分化，這不僅是國家統一前途之梗，而是國家存亡之最大關鍵。這次動戰等事是關係全國生死的戰爭，決不僅是一個領袖或某一個政治團體所能相當的事業，過去之恩怨豈應一筆勾銷，如果我們把民族主義當作口頭語或手段，國家民族就根本無可救藥了。

其次我們更抱定「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決心，也得養成一種「見利不趨赴，義後」的勇氣，把許多繁雜而艱苦的工作，不要推讓或責成在大家的身上，應該自己要一肩担當起來。否則，在處自己想佔圖便宜，彼此不能相諒，所以許多矛盾與紛爭由此而起。

我們有了這個「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決心，同時更要抱定一種「人棄我取」的工作原則，去選擇我們的工作，開闢我們工作的園地。但在這裏我們既不可與人作地位的爭奪，更不可萌著驕恣與人計長量短的淺見。因為有了這一層不可避免的條件，無論表現在那一方面是自尊自太，就不免炫已之長，而鄙人之短，每每形成無意味的爭執和隔膜，成爲了待人處事的一個最大障礙。我們能掃除這一層與人計長量短的條件心理，這無論處在一個對壘場合，都河以安之若素，即令我們受到任何委屈，也就河以把心中忿怒平抑下來，忍痛下來。久而久之，誰是國家的忠良，誰是篤信於三民主義的真實信徒，忠愛於黨的勇敢忠忱的鬥士，誰是假離離領袖之名而爲貪污自私禍國殃民之輩，這都逐漸事實上有一個明白

的分曉。老實說：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是不容絲毫含糊，更不容飾詞假借的，那麼我們以堅貞剛毅勇敢的行動，便可以取得人的同情了。

我們已具備一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根本信念。又養成了堅貞而刻苦耐勞的精神，然則怎樣去決定在道德上的行動範疇以奮發鼓舞蔚成爲優良的風氣呢？

一、要具有特立獨行的異稟，不爲威屈，不爲利誘，而養成一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的氣概。如此一富貴不能淫，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雖至身可殺而不可辱，身可危而志不可奪，這便是孟子說的「吾善養吾浩然之氣」也。

二、明辨是非，執仁而行，抱軀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明乎此義，則行前無所懼，行後無所悔，才能算爲明禮義知廉恥的正人君子。

三、要履安思危，雖不獲肩荷國家重任，萬不可置身一國亡民瘼一於度外，范文正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惟已及物，轉施於衆，仁德便由此而養成了。

四、持身嚴謹，居處不淫。固我之所有，亦不可浪費浪擲。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蓋古人所謂「一介不以取諸人，一餒死事小，失節事大」，就是這個道理。大禹謨曰：「克勤於邦，克儉於家」，如此可以養成廉德了。

我們這想樣去立言呢？這便要確立一個基本原則，就是一派除意氣，曲盡情理也。雖然在平時對政府的措施，縱有不滿，對政府的政見縱有不同，到今日應該一切不談，什麼恩怨，也應一筆劃銷，服從最高統帥的命令，來維護這個抗日的領導中心。因此我們要提防敵寇分化我們的政治陰謀，要聽見汪逆兆銘所高唱的荒謬口號而不知所警惕，（馮副委員長語）堅強民族意識，不要幫助敵人來做毀滅自己的工作；我們更要認清國家當前的危機，謹嚴自己的責備，不要為敵人開闢道路。因為現在我們要知道國家民族危亡的關鍵，就是社會秩序的安定，能够使政府竭誠推行其既定的國策，而不致擾亂步驟。反之，紛紛擾擾，莫衷一是，縱有顯明的政策，而不獲忠實努力的推行，怎能以救國家的傾危？但是社會要怎樣才能安定呢？這便需要健全的輿論了。一面要靠輿論向全國民眾闡明國策，一面也要靠輿論去督促政策政令的執行。可以說輿論是社會上對現實種種具體的反映，無論為政治的設施，經濟的結構，現行的制度，偶然要引起社會向前推進的失調，便要反映在輿論身上了。

我們可以說：輿論界的職責，便是對於歐風惡俗能痛下破石，對於一切不當於義理的行爲，能予以嚴厲的抨擊，以盡其自誅筆伐的最大功用。至於表現一般庸俗，無正氣，甚至模糊，專只等於一種「妾婦之道」，既不是社會上真實的反映，也就不能推動社會向前推進，甚至只有阻礙社會進步，這便要使輿論的真實價值無形喪失。因此輿論的不健全，會要引起社會的是非混淆，社會愈多而國是愈混亂。

這時期末也國的景像，可謂前車之鑒了。在今日不用此類大候，引起社會的騷動，形成政治的動盪不安，是否要替在言路腐雜呢？我們今日講求立憲政治，然則要怎樣才能造成健全而真實的輿論呢？

特不可以真為託，並誣証人之名以爲資，因爲這種舉凡內政外交，皆可資爲鑒證者，莫不交相辯議。

而其有所論列，皆無真實的基礎，不過藉以攻擊他人，此種輿論表現的力，其最爲危險。

然不問單憑其臆說與私見，甚至漫無條理，橫施抨擊，應該以冷靜的頭腦去分析四週的環境，以

及在工作止所能遭遇的困難，同時要爲此問題謀得妥善解決的方針，把主觀的力，推與客觀的條件

適當配合起來，才不致形成閉門造車的謬誤，而向今日引來以即因循，一而再，再而三，自食其言。

一、立憲最爲尖銳的楚浮際，淺識而不致流爲意氣之偏，這不但是出於胸臆的動機，不能輕率，而是

心腸太熱，期望太高，相守切繁複雜紛的問題，看得太單純，最易於成失望與悲觀，自不免遇事

生風，

(三) 我們對政府應盡的言責和努力

我們要認識時代，當前國家民族的地位，已臨到如何危急存亡的緊要關頭，因爲在今天國家的現狀之下，已明顯看出不能仰賴於山下，山上的革命方式，達到改造國家的任務，還必須有賴於山上，山下的革

新的努力，振起既死的人心，以挽回國家的劫運。這是一個什麼道理呢？

我們對於歷史的每一個變動，都予以精確的分析，如果在我們國父領導排滿革命運動的時候，還有個人敢於有爲，保存皇立憲，便是國父殘害種族，阻抑時代前進的罪徒。再則在袁世凱專制獨裁之末，以在安福系執政的禍國殃民之下，甚至跟着紅羅漢賣身的豬仔議員去講民主政治，是何等的無恥。但與今天我們應該認清空額二致所期望的，是要求民族地生在國家的獨立，人民的生計的安定，所以當前感到最急迫的，是如何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將出中國，而使全國同胞從慘寇兇殘的轟炸，磨殺，焚燒，剝削，壓迫，下推，殺害，虐待，抗戰勝利之後，恢復大地，回復社會的安定，而使整千整萬流離轉徙的同胞獲得安息。因此要請全國統一由政府，能集中全國的抵抗力量，但必須發揮全民族潛在的抵抗力量，不容有分毫之毫末容有割裂，不滿，不能抗拒，陷全國於支離破碎，土崩瓦解的現象。古今來許多亡國滅種的事實，又未足以爲我們的警戒嗎？

此時至中，爲什麼會呈現一種動盪不安的局勢呢？就是各自爲着利己的打算，不惜盡力來造成其勢力範圍，或設法擴大其勢力範圍，終身動心，而不顧大體，真充分表現出一種浮燥，淺識的態勢。同時，由於政府的一時失察，未能審慎去取，也容易引起人的失望，他是社會的改造，不是一蹴而就的。因而我們期望，不可過高，連累頭腦冷靜一點，才不會流入意氣與偏見，可以說：這種主觀的放棄，不

以種種手段，不惜造作邪說，混淆是非，更不應顧及個人的利益，以阻礙社會國家的進步。即如在目前我們受到任何委屈，誰也應該把一切忿怒壓抑下來，千萬不可加以無禮的拂逆，以削弱自己的力量。這樣靜心下來，又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還有什麼憤懣不平之氣呢？但是有度量的人，一定不肯冷靜地沉思，因為當時只有一個抗戰問題，一切以有利於抗戰為中心。因此國家民族的利益，應高於任何黨派的利益。所以在今日而需要全國朝野上下，一心一德，同舟共濟，患難與共，在災相倚，共同維繫國家的生存。

因為這很明顯可以看得出來，這就是下個國家遭逢離國外患的嚴重危機的時候，應該全國朝野上下通力合作，不致拘泥於派系的黨見。譬如現在美國羅斯福總統誕生，是共和黨黨員，而且曾任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的政黨總統競選時，曾立於反對黨的地位，激烈地攻擊過羅斯福。為什麼能在羅斯福總統之下而供職呢？固然是羅斯福總統有超羣的政治眼光，能容納反對黨而予以顯要的職位，同時也由於衆望所歸，在野地位，才能寄與政府以深厚的同情，而儘能給予政府以莫大的助力，以圖利其進行既定的國策。雖然美國已遭逢世界空前的危機了，但以視我們今日國家的處境，又何止相距幾千萬里！然則我們對政府與如何去竭誠忠貞的努力呢？

從國家的根本需要上，我認為三十年來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是「教育」的努力，可謂全部歸於虛空了。

爲什麼人家能一貫教育方針的努力上，能培養出立國的領袖，而我們則反是呢？固然風氣的養成，是許多人爲的原因的，但最根本的原因，便繫於教育者的功罪了。敢說當前國民精神的頹廢與潰滅，是這滄抗戰建國的進程之最大因素。所以抗戰以來，這充分表現出進步不足的現象，也得看成許多錯誤的現象。無疑義在今日教育上的改進，與教育事業普遍的發展，有重新決定其內容和忠忱堅貞努力的必要。非如此那樣忠忱而堅貞的努力，才可以獲得國民精神的根本改造。同時精神動員的實施，民族精神的發揚，尤都靠我們以身作則，做出個好的榜樣來，才能成爲社會的領導，民衆的矜式。因此需要我們以畢身精力，不以爲始，始終不斷的努力，那容我們瞻顧徘徊而畏縮不前呢！

從政府現實的缺欠上，我們要認清在抗戰的環階裏面政府最感到缺欠的是什麼？可以說在「抗戰建國」雙重努力的意義上，便需要我們在野人士對政府的盡力支持，這與支持力量的繼續生長，便始國家絕大的進步。從積極方面的努力，要從事於國民經濟的建設，才能構成爲現代國家的物質基礎。這時我們儘可把政治上的支配慾和占有慾，一概清除，應該埋下頭來，致力於「生產建設」事業的發展，富源的开发，更謀充實國家資金，上資本的大量集中，以從事於大規模「國防工業」的建設。從消極方面的努力，在要盡力幫助政府解決戰時財政上的困難，同時要求得一個合理的解決，譬如黃炎培先生以在野之身，而優優風塵，以發動海外僑胞來推行大規模的節儉運動，使各地僑胞來認真種種購置儲蓄等事，這顯

於政府的助力，是極端偉大的。又如在各方面感到人材的缺乏，就應該以在野之身盡力來推補人材，無論政府引用與否，都要盡力來推薦。這都是針對政府現實的缺乏上而發出的呼聲，絕沒有包含絲毫與人作對的雜毒的不純正的作用在裏面。可以說：只有這樣，我們在野人士對政府一點支持力量，才不至於繼續下去。

從人民一般的要素上說，這裏我們雖然要不斷來鼓勵全國民衆忍受抗戰的苦痛，去爭取整個國家的自由獨立與生存，但是一切有關於人民生計的政令之推行，要能與民衆的要求相適應。譬如徵稅的推行，尤其一個命令要拿到鄉鎮以下去執行，許多憑藉其地位去詐索人民，以及征調機關的營私舞弊，使人民感到惶惶不安。又如糧食管理，弄到許多產米的地方（如洞庭湖沿岸各縣）曾經一度鬧着米荒，果真是由於政府收購一掃而光嗎？再如行將實現的專賣問題，更與民生福利相關切啦。就拿巴徠江西的食鹽專賣而論，官鹽市價一元半，而黑市鹽價竟達五元，果真是政府的統制政策不相適切而流弊滋多嗎？抑或兼衡物價的有效辦法，就是嚴格規定價值，但物價不僅不因此而平抑，反足以刺激物價的向上騰漲，甚至無從購買，難道是政府之失其權衡而不獲適當的解決嗎？這一切都說明，我們在野之士不能漠視國家大議，而沒有形成對政府的支持力量，就是社會上缺乏嚴明裁制與督責的力量，遂致人心凌瀆，政府的意志，不能貫徹下去，轉使良法美意變為病國病民的弊政啊。

我們應該既又怎樣繼續其應盡的責任呢？固然我們不可稍萌意氣，對政府妄肆抨擊，要停止一切無關於抗戰救亡的樞本政策的爭論，但有關於抗戰救亡的根本問題，應該不避嫌怨而誠懇坦白地提陳出來，以備賢明當局的採擇。這就是說，我們要泯除意氣，就要具有平恕待人的心腸。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們要時刻站在對方的地位，把愛護自己的心腸去愛護人家，把看待人家的地方來看待自己，這也就是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道理。因此我們要認清平恕待人，而不是看種族，看包圍，看黨在政府一切措施上，也就不能認為沒有缺欠的地方，我們應該用互匡救過來。如果我們僅在表面上是為求敷衍，而在骨子裏各有所懷之鬼胎，彼此疑忌，各懷私見，怎能造成一個精誠團結的完整局勢呢？格齋說：「君子愛人以德，我們在野之身，抱定忠恕的態度去誠懇熱烈的對待政府，本無非忠之所在，守住此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指條，以盡其心力之所及，竭盡其對政府應盡的責任而已。」這裏我們要向着這個方向去致力呢？

孔子在各種除淫濫之際，將正盜劫食鄙腐惡的行為，公尚書伊訓總云：「正刑官刑，傲於有位，曰不敬，有損舞於宮之辭，歌於室，時謂淫風，敢有殉於聲色，世於遊飲，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違善德，任刑罰，時謂亂風。推茲三風，士有亡於身，象必喪，邦君有亡於身，國必亡。」臣下不匡以美刑，所以在此當時守法的精神不能維持於外，不義不為是貪污與不匡同受刑，因此當時政治之修明，

其本為後世所不能及。但在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是法令與事實相距的地方太遠，往往三令五申，只等於一紙空文，其緣故所在，就是「不匡」，推其所以「不匡」之故，就是病在官官相衛。真德秀云：「良下所以不匡，以其貪官固位故也；不諫之罪，與貪墨同，使人知不獨貪賄之有罪，而廉官之不諫，亦有刑也。」但在今天官官相衛和同儕黨派的積習，而立身於朝的人，誰都具有五刑京兆的心理，以為大勢所趨，「相率以爲風」，所以敢以身負檢舉貪污重任的人，却含默無一言，以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更不如無事之爲妙。因此在野之士就應該負起檢舉貪污的責任來，養成社會上偉大的裁制力量，那麼貪官污吏的罪惡，豈不不難呢！

其次，針對着前項的需要，以謀適宜的對策，并預爲籌劃各種問題的措置方案，以供政府的採擇。從政府的施政方針去看到它的政績，不能達到安民養民救民所預期的目的嗎？同時且前所遭遇的困難以及如何渡過嚴重難關，都需要我們在野之士予以縝密的政慮，盡量提供意見於政府當局。再進一步說，我國經濟的偉大人力物力，果實盡量發揮使用出來了嗎？因爲不能集中發揮使用全民經濟在的抵抗力量，而不能顯達日本帝國主義者出中國，此種極明。但爲什麼至今天而不能收到精誠團結的實效，其原因究在經濟？這正是當前抗戰時期所應發慮而亟謀解決的問題。至於戰後問題更來得迫切，果不能預籌劃各種問題的解決方案。其一是如何回復社會的安定，撫輯流亡，重新建立社會基礎。其二關於前此及前

經濟深遠之變也。倘能成爲現代的國防建設，俾能維持國際均勢，以奠定世界永久和平的基礎。蓋此蓋戰後
經濟的基礎之強盛軍人的出處，以及戰後的財政問題，皆經濟事業的興辦，因此這一切問題，都必須
放在在動，預謀妥善的解決，以盡其意見和方案提供出來。

第三應隨時提示政府以新的提示而提高其警覺性，以促成政治的進步。我認爲政府最感到舉止失措的
是經濟的危機未除，而新的經濟隨着新的法令創立或變更而增長了，往往一樞新事業的舉辦，未見其
利，而先蒙其害，這樣預期的成功，竟招致失敗，其咎責就是我們在野之士沒有竭盡其言責。我們僅就
經濟的專業來說，高資額度的本身是否有缺欠呢？當然在「調節供需，平準物價」的原則之下，可謂國
計民生無不應有盡有。但我們必須設想，縱令沒有人濫用權力，無弊營私，而所任用這一大批經營企業人材
是否從社會無方法選拔呢？尤其一般人士都缺乏從事商業的那種認真向上的奮鬥精神，將來難免國營公司
出來與人民對立的狀態。同時就這種種專業而論，無一不與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如果能平抑物
價減輕人民的負擔，又能鼓勵生產及合法商人的轉運，這就可以達到戰時經濟的目的，并進而奠定民生
主義的基礎。如果稍有不當，便影響國民的生計，進而動搖國家的根本。我們就應該把這些地方提示出
來，以促起政府當局的重注意，俾能從機構上人事上而一掃過去用人行政之污點，以新的精神去完成
戰時經濟作戰下所負的重要使命。

與初蘇海軍

七言詩餘論

我們從這偉大抗戰的巨變中，已充分顯現出民族性的優點與缺點。如何糾正其缺點而如何發揚其優點，這就我們應如何奮鬥。這也是一種切地反省的。這也是我民族最後一種反省的時機。我們看到國際局勢的演變，還有今天我民族復興的一個千載一時的良機。如我們不能趁此良機迎頭趕上，這就為現代國家的勃發與繁榮，努力完成為現代的國防建設，則此良機便即逝了。我們要怎樣去乘此緊迫的這千載一時的良機呢？

我們處在內憂外患交相變通的今天，若要堅確樹立一個國家民族的領導中心，才能担負起復興國家民族的任務，當此誰也應該真誠的瞭解。在這種支離破碎的險惡局勢之下，敵人的分化陰謀，得以大借口。假使我們不趁此千載一時的良機，去盡心去盡力，在各方面佈滿網羅，去救濟奴役我民族的種種勢力，以誰能把握住這千載一時的良機，在國家的中心，再建立起另一中心，來拯救中國呢？老實說，我們當前，我站在中國國民革命領導之下，以博大精深的三民主義，更有了堅苦卓絕奮鬥的，慷慨激昂的，我們這公報就不容我們有絲毫的疑慮，恢復的地方，因為在目前政治上的最大使命，是一抗戰建國。

，「抗戰建國」工作的重點，雖在繼續不斷從事於民力的培養，尤必有賴於社會的安定。政治的安定，才能完成「抗戰建國」的雙重使命。

我最後要作一種切實的呼籲……

1. 從社會的安定說：抗戰以來，不但是淪陷區域的社會組織基礎，已經根本被摧毀，即抗戰的大後方，雖然社會秩序沒有急劇的變動，但由於物價高漲，形成一般人民生活的苦悶，歐洲以西方人民播遷，流離轉徙，至少可以說，由於外界的誘惑或內在的矛盾，這種不安的危機是隱伏在週圍的。單說社會的不安，僅由於內在的矛盾，天災匪禍以及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壓榨，弄到人民不安心生業，形成社會上普遍的動盪不安，但以視中國的民族性，若非有外在的誘惑，雖至饑饉載道，滿目瘡痍，而社會表面的秩序，仍然可以維持下去。如民國二十五年長江流域的大水災，即在革命的機械論者看來，直以為是有利的時機了，因為這樣可以要求大部求食的民衆，揭竿而起，以為付與社會能不因此而擾亂起來？因此在這裏我們要知道有了外界誘惑，即在靜止的社會狀態中，而能製造社會大的騷動出來，如民國十五六年湘鄂贛農民的大騷動，演成長期的流血慘劇，這還不是人為的造因嗎？既然在當前社會的週圍，隱伏着這種種不安的危機，便有不少做的人，想利用時機而製造社會一番大的騷動出來，固然一般人民救死不遑，整天在這裏期望着早日能回復社

會的安定，也就是說今天的老百姓，已飽受日本鬼子慘酷的教訓了，惟一的期望，是把日本鬼子驅出國境，能及早享受太平的日子，但是如在盧德快着好亂思逞的人，好像在劫和天開來變成一個什麼獨特的局面，不存國家大體，以為這樣可以一發洩私忿大快私忿啦！因此這一切都不該我們輕忽，所以當前無論為在野之士，應該具有一個共同的警覺。要從大眾的根本上，來努力回復社會的安定；尤其是戰區的痛自瘡痕，百廢待舉，而重新建立社會的組織基礎，從建國的意義上說，更應該使一切設施均能從安定社會的目標上而努力，把國家的基礎建築在社會新的經濟結構和立國精神要素之上。這可以說是國家危亡所關的一樞要措施。

2. 從政治的安定說：民元以來的政治局勢，就未曾顯出過安定的一天，弄到縱橫捭闔，政爭不息，許多應與應革的事業，因此而遲緩下來，直至抗戰開展，才直接感到國防力（包含全國的組織力、精神力與物質力而言）的薄弱，準備的不充分，要不是得天獨厚，便賴着堅苦博絕昏明的領袖來撐持危局，早已陷國家於分崩離析之慘狀了，怎能談得上持久抗戰。但在今天我們無可諱言的是政治上如隱蔽無數不安的因素在裏面，縱令國際形勢的好轉，軍事的穩定——甚至可以坐待日本軍閥之必見崩潰，而此種政治上潛在的不安苗素一日不根絕，便見得危機四伏，就無從保證抗戰建國之必勝必成，所謂外患未除而內在的隱憂復見滋長，這是一個什麼原因呢？我老實不客氣的

說：許多對着政權存着「臥榻之旁不容他人鼾睡」底謬見的人，遇事不該人染指，甚至遇事對人
不對事，把一種疑忌的眼光看在人家的身上。試想什麼艱難事業不需要與人通力合作，而獲得成
就嗎？即令自己有做得好的絕對把握，就難道讓別人永遠被擠出工作的圈子以外而能不另求出路
嗎？這可以說是形成政治不安的一個外在的原因。還有一個內在的原因，就是一個生動而活躍的
政治團體，偶然接近政權，便可能引起其腐化與惡化——權勢利害的衝突，內在的矛盾和不安隨
之增長了。既然政治上的不安，有其內在和外在外在的兩重原因，我們就應該去針對時病，努力根絕
這一切不安的苗素。唯一的癥結，是要求政府本身能健全起來，尤其是許多想闖進到政府裏面來
一試身手的人，也應該給予他一個嘗試和發展才能的機會，真正使一個國家的人材能大量集中，
政治顯見得安定了，有誰來冀圖不可必的富貴而去找旁的出路呢？反轉來說：政治上不求安定，
人材不能集中，仍然可以回復到割據稱雄的舊態，再把「抗戰建國」的進程加上五十年至一百年
，也未必有效。所以集中人材，謀得政治上的安定，實為「抗戰建國」當務之急。

總之，我們今天所目為內政、外交、軍事、社會一切問題的癥結，都決定在朝野的關係上，朝野隔
膜，是政治腐敗一個最主要的因素，所以歷史上任何朝代的政治變動的不斷趨於，是以此為轉捩的。我們
們在當前要希望社會和政治的安定，這絕對不要忽視歷史的教訓。正因為有了歷史的教訓，才使我們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元月十五日出版

政治節操問題

每冊定價二元四角

(外埠酌加運費)

著者 洪 鼎 鏡

發行者 中國文化服務社廣西分社

社址：桂林桂西路第十七號

印刷者 科學印刷廠

版權
翻印
必究

5418-8

3 : 6 0 1
2.40